

從著述的年份及其作者的地理分布看 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

張錦少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前言

「三家《詩》學」指專門以漢代《魯詩》、《齊詩》、《韓詩》為對象的學術研究，這包括三家《詩》經文經詁、詩旨詩說的輯佚、整理、研究工作。清代是三家《詩》學史上人才輩出、名著湧現的年代。近年有關清代三家《詩》學的論著不少，有專論，¹亦有通論，²就中不乏析述詳明之作。但若以研究方法來考量的話，這些論著至少有兩個局限。其一是論述過分集中在若干學者及其著述上。葛兆光指出中國思想史的敘述方式，往往是「用人們常讀的經典文本當資料」，讓人認定「真實的思想史歷程就是由這些精英與經典構成的」，但他懷疑「某些精英和經典在那個時代究竟是否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說的影響如此巨大與深遠」。³同樣地，以學術史的角度敘述清代三家《詩》學

¹ 如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9月），頁305-36；〈論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之定位〉，《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8期（2003年12月），頁87-124；〈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及其相關問題〉，《漢學研究》第22卷第1期（2004年6月），頁219-51；趙茂林：〈王先謙與陳喬樞三家《詩》研究比較〉，《廣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頁126-28；何慎怡：〈魏源論《齊》、《魯》、《韓》與《毛詩》的異同〉，載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651-62。

² 如俞豔庭：〈三家《詩》輯佚考〉，載中國詩經學會（編）：《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頁520-28；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49-62，583-95；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93-621；趙茂林：《兩漢三家〈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二節「清代的三家《詩》研究」，頁32-85。

³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0，12。

發展的論著，也存在過分強調若干學者、著述的問題。專論一家一書的論文，限於體例，固然難作通盤考察；但目前所見的通論文章，也不過是選取為數不多且為人們熟知的學者及其著述來概括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至於那些名不經傳的學者，那些未經刊刻、只有稿本或鈔本存世的著述則多湮沒無聞。其二是忽略地理分布對清代三家《詩》學的影響。上世紀二十年代，梁啟超發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揭櫫清代學術風氣與學者地理分布的關係。誠如梁氏所言，這種研究方法確是「治人文科學極有趣味、極有功用之業也」。⁴近年美國學者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在《從理學到樸學》一書中，「力圖透過政區和地方史的視角」來考察清代的考據學。⁵他利用乾嘉時期考據學者的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學術交誼等資料，總結出十八世紀江南地區學術交流網絡，對清代考據學的發展起到積極推動的作用。其後麥哲維 (Steven B. Miles)、竺靜華等亦從比較正、續《皇清經解》作者的地理分布，考察清代考據學的演變。⁶可惜這種結合地理分布的方法，迄今尚未見用於清代三家《詩》學的研究上。

筆者以為解決第一個局限的方法是盡量收集清人有關三家《詩》研究的著述，並以量化統計的方法，歸納清人取得的實績。至於解決第二個局限的方法，則是運用結合時地的研究方法，以學術史資料長編的形式，按照時間先後順序，將成書或成稿年份可考的著述繫年，再配合作者的出生年份、籍貫、生平行誼等資料，描述清代三家《詩》學形成、發展、嬗變、總結的歷程。本文之撰，即採用這兩個方法，首先著錄清代三家《詩》學著述書目。臺灣學者蔣秋華、王清信纂輯的〈清代詩經著述現存版本目錄初稿〉著錄了各地收藏、刊行清代《詩經》論著的資料，是迄今最詳細的著目。⁷筆者以該文「三家詩之屬」⁸的著錄為基礎，⁹再以相關史志、書目、專書專

⁴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載存萃學社（編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參考資料》（香港：崇文書店，1973年），頁130。

⁵ 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序〉，頁2。

⁶ 麥哲維：〈考證學的新面貌：從《皇清經解續編》看道光以下的學術史〉，《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11期，頁175-92；竺靜華：〈從正續《清經解》的比較論清代經學的發展趨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99年），頁14-15。

⁷ 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嘗謂陳鴻森有〈清代三家《詩》著述考〉未刊稿，惜筆者無緣得見，未能引用。

⁸ 蔣秋華、王清信（纂輯）：〈清代詩經著述現存版本目錄初稿·三家詩之屬〉，載吳宏一（主編）：《清代詩話知見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716-24。

⁹ 〈清代詩經著述現存版本目錄初稿·三家詩之屬〉頁721提到陳鱣有《三家詩拾遺》十卷，現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但據筆者寓目所及，此本實是范家相《三家詩拾遺》的鈔本，上有陳鱣若干校語而已，非陳氏所著，故本文不加入錄。

文等補遺，¹⁰共錄得專門以三家《詩》為研究對象的清人著述七十五種。¹¹著錄這些著述時均附以作者姓名、生卒年及其籍貫等資料，然後按照這些著述成書或成稿的年份先後次序排列。¹²「成書」指刊刻成書。由於部份著述有超過一種版本，本文根據最早的版本繫年。「成稿」則指著述未經刊刻，只有稿本或鈔本。至於部份稿本、刻本並存的著述，則以刻本為據。¹³最後把資料整理成附錄「清代三家《詩》學知見著述繫年表」，並以此為全文的立論張本。

¹⁰ 「史志」包括：(一)曹家駒《詩三家異文詁》，據李榕：《杭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卷八六，頁一五下；(二)葉裕仁《三家詩攷箋證》，據王祖畚等：《鎮洋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卷一一，頁二上。「書目」包括：(一)陳慶鏞《三家詩考》，據郭靄春(編著)：《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頁12；(二)趙紹祖《校補王氏詩考》，據朱師轍(輯)：《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55；(三)陶方琦《魯詩故訓纂》，據呂幼樵(校補)：《書目答問校補》(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6；(四)汪遠孫《詩攷補遺》、黃模《三家詩補考》、曾家駒《詩三家異文詁》、董沛《韓詩箋》，據宋慈抱：《兩浙著述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77，281，283；(五)周曰庠《詩經三家註疏》、龍璋《韓詩》，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439，449；(六)顧觀光《韓詩外傳逸文》、郝懿行《韓詩外傳攷證》，據孫啟治等(編)：《古佚書輯本目錄附考證》(北京：中書書局，1997年)，頁35；(七)邵晉涵《韓詩內傳考》，據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編)：《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8。「專書專文」包括：(一)汪照《齊魯韓三家詩義證》，據王昶(輯)：《湖海詩傳》，《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八年(1803)三柳漁莊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三〇，頁一九上；(二)王謨《韓詩拾遺》、皮嘉祐《韓詩疏證》，據陳鴻森：《〈韓詩遺說〉補註》，《大陸雜誌》第85卷第4期(1992年10月)，頁18；(三)余蕭客《古經解鈎沈》、龔橙《詩本誼》，據葉國良：《〈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鑑別》，《國立編譯館館刊》第9卷第1期(1980年6月)，頁99；(四)楊晨《詩攷補訂》，據張祝平：《〈三家詩〉輯佚研究的重要系列著作》，載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三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頁609，613；(五)皮錫瑞《詩經通論》，據洪湛侯：《詩經學史》，頁604-6；(六)曾廷枚《毛齊魯韓四家詩異同》、李貽德《詩考異》、郭慶藩《齊魯韓三家詩義證》、黃啟興《詩考》、李德淑《毛詩經句異文通詁》，據房瑞麗：《清代三家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附錄〈清代三家《詩》著述目錄考〉，頁176，179，180。

¹¹ 這七十五種只是筆者的所知所見，清人的著述當不止此數，部份很可能未經著錄，或者散失無存。不過本文收集的著述大體上仍能反映清人研究三家《詩》的成果，可以藉此了解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另外，惠棟的《九經古義》、嚴虞惇的《讀詩質疑》、沈淑的《經玩》等書雖間及三家《詩》輯佚，但非專門以三家《詩》為研究對象，故本文不予收錄。

¹² 刊刻成書的著述與只有稿本存世的著述在流布範圍及學術影響上固然有所差別，但為了全面反映整個清代三家《詩》學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將只有稿本或鈔本的著述繫年是有意義的。

¹³ 臧庸的《韓詩遺說》、許瀚的《韓詩外傳校議》、馮登府的《三家詩異文疏證》、龔橙的《詩

〔下轉頁180〕

著述成書或成稿的年份及其作者的地理分布

附錄所收七十五種著述中，成書或成稿年份可考者共四十八種，最早的是乾隆十九年(1754)范家相(1715-1769)¹⁴的《三家詩拾遺》，最晚的是民國二十五年(1936)楊晨(1845-1903)的《詩攷補訂》。在范家相以前，惠棟(1697-1758)對三家《詩》已經有零星輯佚，但若論以三家《詩》為對象的專著則首推《三家詩拾遺》。《詩攷補訂》雖刊刻於民國，但楊晨生當清季，故仍屬清人的著述。準此，我們以1750年至1939年為限，每十年為一期，統計每期清人三家《詩》學著述的數量。茲將統計數據圖列如下：

圖一：清代三家《詩》學著述各期數量統計圖

1930-1939	1							
1920-1929	0							
1910-1919		2						
1900-1909		2						
1890-1899					5			
1880-1889	0							
1870-1879		1						
1860-1869	0							
1850-1859			2					
1840-1849								8
1830-1839					4			
1820-1829				3				
1810-1819						5		
1800-1809			2					
1790-1799							7	
1780-1789					4			
1770-1779	0							
1760-1769		1						
1750-1759		1						
								總數

這一百九十年間，三家《詩》學著述集中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這七十年間，共三十三種，佔總數的69%。換言之，這是清代三家《詩》學著述蓬勃發展的時期。

附錄收錄的六十六位作者(部份作者有超過一種著述，故著述與作者總數不相同)，籍貫可考的共六十五位，¹⁵來自十省。茲將各省作者總人數圖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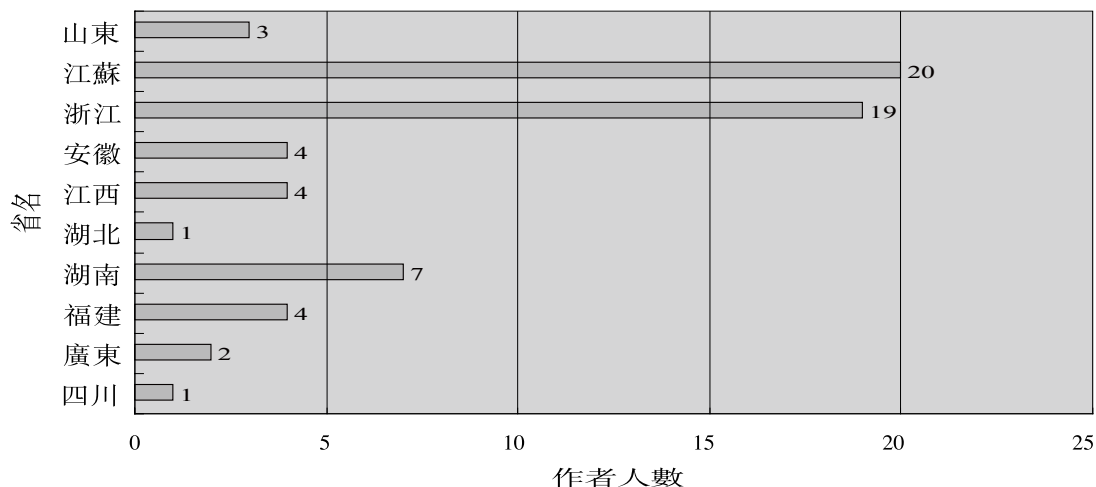
[上接頁179]

本誼》，這四本書的成稿與成書年份相去分別達六十一年、十七年、三十六年、四十九年之久，為了準確反映這四部著述代表的年代，故以稿本繫年，參見附錄考證。

¹⁴ 范家相生卒年據陳鴻森：〈清代學術史叢考〉，《大陸雜誌》第87卷第3期(1993年9月)，頁8。

¹⁵ 陳岫籍貫不能確考。另作者籍貫及生卒年主要據江慶柏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個別考證則在相應腳注中說明。

圖二：清代三家《詩》學著述作者的地理分布統計圖



清代三家《詩》學著述的作者來自江蘇、浙江兩省的最多，共三十九人，佔60%，加上四位安徽省的作者，整個江南地區約佔整體作者人數的66%。下文將根據附錄的載錄及圖一、二的數據，描述清代三家《詩》學發展的特色。

從著述的年份及其作者的地理分布看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

清代三家《詩》學與輯佚相始終

四十八種年份可考的著述幾乎都與輯佚相涉，而且每一個時期都有輯佚著述面世，如乾隆時期有范家相的《三家詩拾遺》、趙懷玉(1747-1823)的《韓詩外傳補遺》等；嘉慶時期有沈清瑞(1758-1791)的《韓詩故》、臧庸(1767-1811)的《韓詩遺說》等；道光時期有錢攻的《〈韓詩內傳〉並〈薛君章句〉攷》、陳喬樞(1809-1869)的《三家詩遺說攷》等；咸豐時期有黃奭(1810-1853)輯《魯詩傳》、《齊詩傳》；光緒時期有顧震福(?-1935)的《三家詩遺說續攷》；直到清末民初仍有江瀚(1853-1931)的《詩經四家異文攷補》、張慎儀(1846-1921)的《詩經異文補釋》等，可見三家《詩》佚文遺說的輯佚是清代學者重視的工作。這些著述固然有純粹輯佚之作，如王謨(1731-1817)、馬國翰(1794-1857)、黃奭、王仁俊(1866-1913)等人將三家遺說見諸舊籍的材料輯錄出來。即使以研究三家經文詩說為主的著述也在研究以外，補苴罅漏，如周廷棠《韓詩外傳校注》外，其兄子周宗杭有《補遺》一卷；郝懿行(1757-1825)《韓詩外傳考證》外，有《補遺》一卷；馮登府(1780-1841)《三家詩異文釋》外，有《補遺》三卷。

至於輯三家《詩》者，則以范家相的《三家詩拾遺》為濫觴。《四庫提要》「三家詩拾遺」條云：

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掊擊漢儒為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剩，輯為《詩考》三卷。然創始難工，多所掛漏。又增綴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為《古文考異》，次為《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為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並見。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為篇者，亦較易循覽。¹⁶

范家相以前，嚴虞惇(1650–1713)、惠棟等學者，已經注意到三家遺說。嚴氏《讀詩質疑》卷十二為〈三家遺說〉，將王應麟(1223–1296)《詩攷》輯錄的三家佚文刪存六十則，是以嚴氏所做的只是刪汰，談不上輯佚。真正作零星輯佚的是吳派漢學奠基人惠棟，成果見於《九經古義》卷五、六的〈毛詩古義〉，其中引《魯詩》六則，《齊詩》一則，《韓詩》三十五則，數量不多。學者又每每將余蕭客(1729–1777)的《古經解鈎沈》與嚴、惠二氏之作相提並論，以三人並為清代三家《詩》研究的前哨。¹⁷嚴、惠二家未成體系已辨正如上，《古經解鈎沈》卷六、七採擷《韓詩》達一百六十五則，數量頗有可觀，但余氏在《古經解鈎沈·後序》中明言：「己卯杪秋，蕭客從事鈎沈。……壬午夏五扶疾繕寫，八月書二十九卷畢。」乾隆二十四年(1759)歲在己卯，余氏始從事輯佚，二十七年壬午(1762)成稿，而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則早在八年前，即乾隆十九年已於會稽刊刻，可見范家相是清代三家《詩》輯佚學的奠基者。范家相以後，清人三家《詩》輯佚工作一直歷久不衰，輯佚工作始終在清代三家《詩》學中佔據重要的位置。這除了受三家《詩》經文詩說散佚嚴重，必須一番掇拾爬梳才能重新研究這個內在因素影響外，清代三家《詩》研究工作始終集中在江南地區這個地理因素也起了關鍵的作用。

江南地區始終是清代三家《詩》學的中心

清代三家《詩》學著述的作者來自江南地區的人數最多，這與整個清代經學發展的軌跡頗相一致。麥哲維分析了《皇清經解》所載七十三位學者以及《皇清經解續編》所載的道、咸、同、光四朝著書的五十五位學者的籍貫，結果發現在反映清初至乾嘉時

¹⁶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一六，頁457–58。

¹⁷ 如戴維說：「嚴虞惇作《讀詩質疑》，其中有《三家遺說》，就是清代對三家詩進行研究的開始。緊接著浙派著名學者惠棟，著《九經古義》，余蕭客著《古經解鈎沈》，對三家詩也進行了輯佚。」見戴維：《詩經研究史》，頁549。又如賀廣如說：「在王應麟之後，三家《詩》輯佚乃長期處於沈寂的狀態，直到進入清代，經由嚴虞惇、惠棟、余蕭客等人的零星輯佚，才又開始為人注意。」見賀廣如：〈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及其相關問題〉，頁219。

期清代經學發展面貌的《皇清經解》裏，江南地區的學者共六十五位(90%)，而《續編》裏所載道光以下的江南地區學者雖然只有三十九位(71%)，但仍屬多數。¹⁸換言之，清代研究經學的學者很大部分來自江南地區。本文收錄的三家《詩》學著述，大部份成書於嘉道之後，時間跟麥哲維統計《續編》時所選取的的道、咸、同、光四朝比較接近。本文研究的六十五位清代三家《詩》學著述的作者裏，來自江南地區的共四十三人(66%)，數據百分比與麥文接近，這顯示無論從整個清代經學發展，或者只看三家《詩》學發展，江南地區的作者均舉足輕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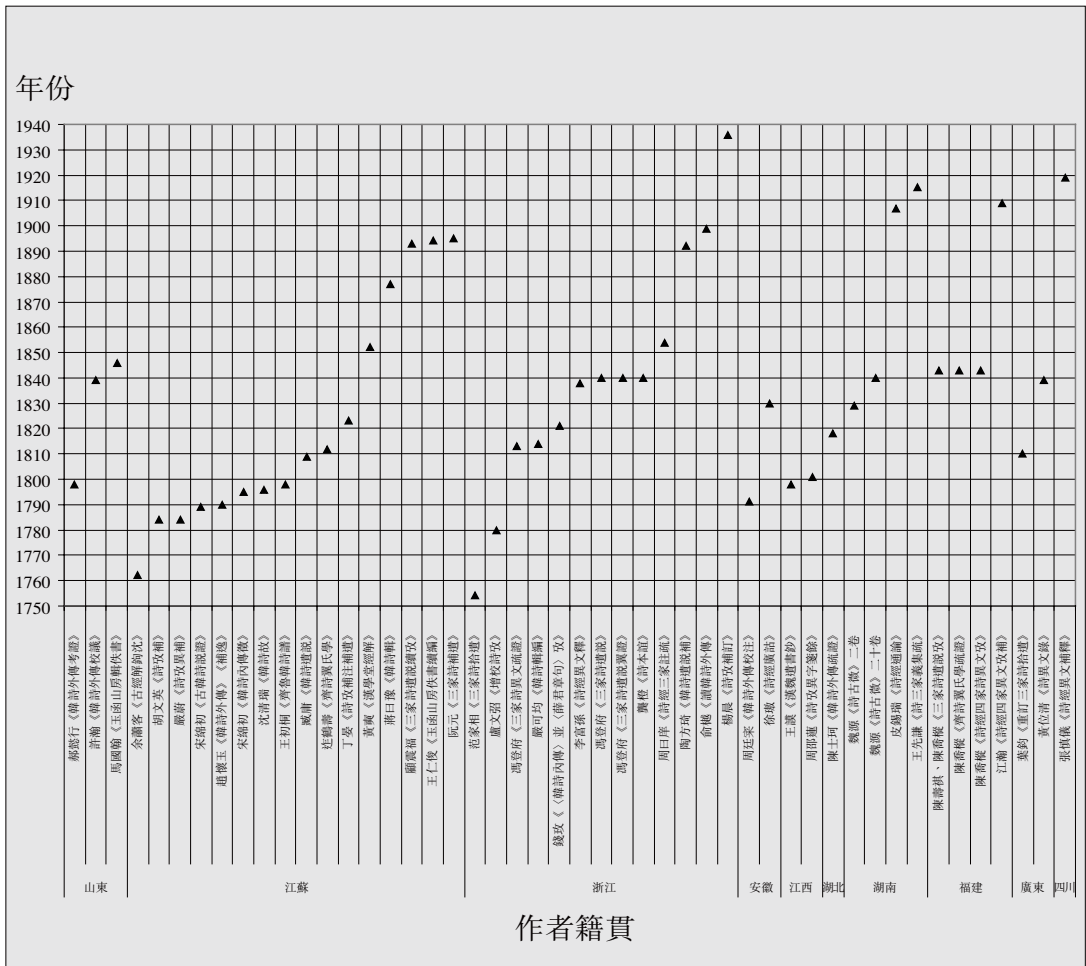
江南地區學者的研究範圍、學術興趣容或有異，如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孫(1744–1832)之於小學，丁杰(1738–1807)之於校勘，張惠言(1761–1802)之於《易》，陳奂(1786–1863)之於《毛詩》，均卓然成家，但他們始終堅持江南地區重考據實證的學風，嫻熟運用漢學家慣用的考據、校勘、訓詁等考證方法。江蘇甘泉人焦循(1763–1820)在〈與劉端臨教諭書〉即提及考據學風靡江南的情況：「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為業，漢儒舊說束諸高閣。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¹⁹講求考據實證的前提是充分掌握文獻材料，但「書籍遞嬗散亡，好學之士，每讀前代著錄，按索不獲，深至慨惜，於是乎有輯佚之業」。²⁰這就說明為甚麼與輯佚工作相始終的清代三家《詩》學著述，其作者多集中在江蘇、浙江兩省。為了更清楚說明這個問題，我們把附錄年份可考的著述，以其作者的籍貫分類，整理而成圖三，藉以考見各省份的三家《詩》研究在不同時期的趨勢。

¹⁸ 麥哲維：〈考證學的新面貌：從《皇清經解續編》看道光以下的學術史〉，頁184–85。

¹⁹ 焦循：《雕菰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四年(1824)阮福嶺南節署刻本，卷一三，頁二五上。

²⁰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319。

圖三：清代三家《詩》學著述年份及作者地理分布圖



從圖三可以歸納幾個現象。第一，清代三家《詩》研究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裏局限在江浙一帶，從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道光三十年（1850），清代三家《詩》學著述的作者集中在江、浙兩省：導乎先路的范家相是浙江會稽人，其後有盧文弨（1717–1795，浙江餘姚）、胡文英（江蘇武進）、嚴蔚（江蘇吳縣）等增訂《詩攷》，宋綿初（1740–?，江蘇高郵）輯《韓詩內傳》遺說，趙懷玉（江蘇陽湖）校輯《韓詩外傳》，臧庸（江蘇武進）輯《韓詩》遺說，馮登府（浙江嘉興）著《三家詩遺說》，李富孫（1764–1843，浙江嘉興）著《詩異文補釋》等。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學者彼此之間多是師友同儕，關係密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指出，清代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途徑是「函札」，所謂「後輩之謁先輩，率以問學書為贄——有著述者則賸以著述。——先輩視

其可教者，必報書，釋其疑滯而獎進之」。²¹ 近人尚小明著《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強調幕府制度促進了清代學術的發展。他認為「由於清代學人游幕非常普遍，而且他們總是不約而同地向某些大幕流動，或向某些地區——特別是江浙地區流動，這就給他們造成了許多交流學術的機會」。²² 梁、尚二氏關於函札、幕府制度這些學術傳播途徑在清代學術交流中所起作用的論述，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學者互不認識，又沒有共事幕主的機會，那麼他們之間互通函札、切磋問學的機會也不會很多。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里門關係便成了促進學術交流的關鍵，這說明為甚麼清代經學研究（包括三家《詩》研究）大都集中在江浙地區。丁杰（浙江歸安）校訂過《詩攷》，他的學友盧文弨（浙江餘姚）在丁校的基礎上「增成之」。乾隆四十九年（1784），盧氏學友嚴蔚（江蘇吳縣）刊刻《詩考異補》。乾隆五十五年（1790），盧氏替趙懷玉校刊的《韓詩外傳》撰序，述其梗概。他的學生臧庸（江蘇武進）後來輯《韓詩遺說》，而稱盧氏為師的黃模（浙江錢塘）亦撰《三家詩補考》。馮登府、李富孫同為浙江嘉興人，同里相善。李富孫著《詩經異文釋》，馮登府「稱其詳核奧博，為詁異義者集其大成」。²³ 馮登府著《三家詩遺說》、《三家詩遺說翼證》、《三家詩異文釋》，同為稿本，當時能夠看到的人應該不多，但三書都有李富孫的校語。²⁴ 此外，道光十八年（1838），江蘇甘泉人黃奭輯《漢學堂經解》，收錄《魯詩傳》一卷、《齊詩傳》一卷、《韓詩內傳》一卷。二十六年（1846），山東歷城人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收錄《齊詩傳》二卷、《韓詩內傳》一卷，二人輯錄的三家遺說相同甚多。這種多人輯一書的現象顯然是迫不得已的，學術交流渠道不多，南北相隔，難免雷同。這都說明了地理分布的限制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裏將三家《詩》學局限在江南地區。

第二，清代三家《詩》研究在嘉道以後雖然出現了幾位主要來自福建、湖南的學者，然而這些學者與江南地區的關係仍然密切。地理分布既然限制了三家《詩》學傳播的範圍，其他地區的學者，很多時候要以游學的方式加入以江浙學者為主體的學術團體，才能一展所長，陳壽祺（1771–1834，福建侯官）、魏源（1794–1857，湖南邵陽）即其佼佼者。嘉慶八年（1803）春，陳壽祺應阮元（1764–1849）之請，至杭州主持敷文書院講席。夏，阮元「選校官及高才生十有六人，採唐以前說經文字，親授義例，纂為《經郭》，而「壽祺與編校焉」。²⁵ 陳壽祺編纂《經郭》與其後來撰集《三家詩遺說攷》關係甚大。阮元曾命畢光琦將久藏於篋的《經郭》抄稿刪節增補，並將《詩》、

²¹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64。

²²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176。

²³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3260。

²⁴ 據蔣秋華、王清信：〈清代詩經著述現存版本目錄初稿·三家詩之屬〉，頁722。

²⁵ 陳壽祺：《左海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刻本，卷八〈西湖講舍校經圖記〉，頁一上至一下。

《書》二經輯出，錄成《詩書古訓》六卷。²⁶《詩書古訓》雖經增刪，已非《經邦》原貌，但如果拿它跟《三家詩遺說攷》比較，不難看到兩書因襲的痕跡。茲以〈關雎〉、〈葛覃〉、〈卷耳〉三詩為例表解如下（表格內只列書名，以省篇幅）。

	《詩書古訓》	《三家詩遺說攷》 ²⁷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列女傳》	《列女傳》（魯，陳喬樞補）
	《漢書》	《漢書》（齊）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	《鹽鐵論》（齊，陳喬樞補）
鐘鼓樂之。	《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韓）
是刈是獲。	《爾雅·釋訓》	《爾雅·釋訓》（魯）
服之無斃。	《禮記》	《禮記》（齊）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	《白虎通》（魯）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	《荀子》（魯）
	《淮南子》	《淮南子》（魯）

由此可見，陳壽祺在杭州編纂《經邦》的經歷是其結撰《三家詩遺說攷》的前奏。

尤可注意者是陳壽祺在阮元幕府期間跟主要來自江、浙兩省的學者交往。根據尚小明的研究，「阮元幕府有學人120餘人〔確實數目是121人〕，是清代規模最大的一個學人幕府」。²⁸尚書附有「清代重要學人幕府表」，筆者根據該書附錄九「阮元幕府」所錄的一百二十一位學人做統計，籍貫可考者一百一十六人，其中非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只有十一人。換言之，在阮元的幕府裏江南學者佔了最少一百零五人（佔一百一十六人中的90.5%）。陳壽祺的學術取向無可避免受到這樣的學術環境影響，其《左海文集》卷四、五收錄與時人書，便屢見他致阮元、臧庸、王引之、段玉裁等漢學名家的函札。

魏源早年游學的經歷見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

嘉慶癸酉〔十八年，1813〕二十歲，舉明經。明年侍春煦公〔魏源父魏邦魯〕起復入都，遂留從胡墨莊〔胡承珙〕先生問漢儒家法。……是時，²⁹問宋儒之學之於姚敬塘先生學塲，學《公羊》於劉申受先生逢祿。³⁰

²⁶ 阮元（輯）：《詩書古訓》，《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阮福識語，頁二下。

²⁷ 案：《三家詩遺說攷》分《魯詩遺說攷》、《齊詩遺說攷》、《韓詩遺說攷》三部，為省篇幅，表格以「魯」表示見《魯詩遺說攷》，餘類推。

²⁸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頁126

²⁹ 嘉慶十九年（1814），據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頁74。

³⁰ 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載《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848。

姚學塽(1766–1826)，浙江歸安人，嘉慶元年(1796)進士，以中書用，治宋學，《清史稿》謂其「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誠」。³¹胡承珙(1776–1832)，安徽涇縣人，嘉慶十年(1805)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毛詩後箋》三十卷。胡氏收到魏源所寄初刻本《詩古微》後，曾致書魏氏，稱其「所評四家異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論」。³²二人當曾就《詩》學函札往還。但若論影響魏源《詩》學最大者，則首推江蘇武進劉逢祿(1776–1829)。劉氏為清代常州今文《公羊》學派的主要人物，魏源受其影響，力主今文經學，其《詩古微》更發揚三家《詩》中的微言大義。道光初年《詩古微》二卷本刻成，劉逢祿即為之序。魏源跟陳壽祺一樣有游幕的經歷，他在道光五年(1825)加入了時任兩江總督陶澍(1779–1839)的幕府，協助陶澍「創海運，改鹽法」。³³陶澍的幕府只有十三人，跟阮元幕府的規模相去懸殊，相似的就是這十三人，江南人仍佔多數(九個有籍貫可考的學者，六個來自吳、越、皖三省)。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第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補高郵州」。³⁴近人李柏榮著《魏源師友記》，收錄魏源師友共二百二十七人，其中除了上舉胡、姚、劉三人外，還有不少江南地區的著名學者如湯金釗(1772–1856，浙江肖山人)、李兆洛(1769–1841，江蘇陽湖人)、龔自珍(浙江仁和人)、朱為弼(安徽休寧人)、宋翔鳳(1776–1860，江蘇吳縣人)、陳奐(江蘇長洲人)。³⁵可見終魏源一生，無論為學為官，都與江南地區不可分割。當然同樣進入江南學術團體的學者，最終選取的治學途徑可能很不相同。陳壽祺、魏源二人並來自江浙以外的地方，陳壽祺的《三家詩遺說攷》，遵循江浙學者提倡的考證實學，重輯佚考據；魏源的《詩古微》，則發揚常州《公羊》學說，力張三家《詩》裏的微言大義。但毫無疑問，二人都深受其來自江南地區師友的影響。

第三，江南地區一直主導清代三家《詩》學的興衰。從咸豐元年(1851)到同治九年(1870)這二十年間，只有黃奭(江蘇甘泉)輯成《漢學堂經解》，周曰庠(浙江山陰)完成《詩經三家註疏》，此外就再沒有別의三家《詩》學著述了。這段時間發生了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佔領南京，改名「天京」。同治三年(1864)，曾國荃(1824–1890)率軍攻破南京城，「天京」淪陷，歷時十二年的太平

³¹ 趙爾巽等：《清史稿》，頁13154。

³²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卷三〈與魏默深書〉，頁三五上。

³³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1。

³⁴ 同上注。

³⁵ 李柏榮：《魏源師友記》(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頁17，19–20，27–28，70，72，83–84。

天國之亂結束。太平天國控制的範圍包括了整個江南地區，江浙兩省的人因避亂而鳥散。根據何炳棣的研究，嘉慶十七年(1812)、咸豐九年(1859)、十年(1860)三年浙江省人口數目分別是27,411,310、30,399,000及19,213,000，³⁶可以看出太平天國之亂導致江南地區人口銳減。

太平天國之亂也影響到學術活動，根據王鑒在《黃氏逸書攷·序》的記載，黃奭所輯的《漢學堂經解》「工甫竣，值咸豐兵燹，避亂鄉居，板存蕭寺，先生旋捐館舍，寺僧不知護惜，散失數十種」。³⁷咸豐兵燹即咸豐三年二月，太平軍攻佔揚州一事。黃氏於此年避亂鄉間，《漢學堂經解》也只能刊成樣書，沒有流布，後來書板更因為戰亂而散失。江南地區的戰亂是三家《詩》學著述在這個時期突然減少的原因。亂後，三家《詩》學著述又明顯較前增加，這些著述的作者也主要來自江、浙兩省，例如江蘇有陽湖蔣曰豫(1830–1875)的《韓詩輯》、吳縣王仁俊的《玉函山房佚書續編》，而浙江則有會稽陶方琦(1845–1884)的《韓詩遺說補》、黃岩楊晨的《詩攷補訂》。清代晚期三家《詩》研究經過十數年的戰亂，漸次重振，而導其源者，跟清代早期三家《詩》學一樣，都是來自江、浙兩省的學者。由此可見，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由輯佚始，也以輯佚終，就中江南地區以考據實學相尚的學者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地理因素與清代三家《詩》學發展關係之密切於此亦可見一斑。

增補校注《詩攷》是清代三家《詩》學中重要的主題

清代三家《詩》學與輯佚工作相始終，而王應麟的《詩攷》首開三家《詩》輯佚的風氣，因此備受清人推崇，增補校注《詩攷》成了清代三家《詩》研究中的主題。漢代三家《詩》自《毛詩》獨尊之後，幾成絕學。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孔穎達(574–648)《毛詩正義》，作為明經取士的標準。由於《正義》嚴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毛傳》、《鄭箋》成為釋《詩》的唯一標準，學者不敢輕議毛、鄭之失，三家《詩》學更無人問津。到了宋代，疑經思想漸興，學者逐漸不再迷信毛鄭以來的《毛詩》學傳統，而三家《詩》學則重新納入宋人解《詩》系統裏。囿於材料湮沒無聞，研治三家《詩》必須先作一番系統搜羅。王應麟順應了這一個學術潮流，網羅傳記所述的三家緒言，輯錄整理而成《詩攷》五卷以「扶微學，廣異義」。³⁸《詩攷》既屬首創，掛漏失檢，自是難免；可惜其後的元明兩代，三家《詩》學創獲無多。真正賡續三家《詩》輯佚研究工作的是清代學者。

³⁶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56, 70.

³⁷ 黃奭(輯)：《黃氏逸書攷》(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序〉，頁一上。

³⁸ 王應麟：《詩攷》(臺北：華聯出版社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元後至元三年〔1337〕慶元路儒學刊、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修補本，1964年)，〈序〉，頁一下。

乾隆四十五至五十四年(1789)這十年裏，三家《詩》的著述開始增多，年份可考的共四種，其中盧文弨的《增校詩攷》、胡文英的《詩攷補》、嚴蔚的《詩攷異補》，便是校補《詩攷》的。另外，丁杰《詩攷》校本的成稿年份雖然不能確定，但盧文弨寫在乾隆四十五年的〈增校王伯厚《詩攷》序〉記云，「近又得歸安丁小雅校本，凡王氏之沿譌互異者，一一釐革」，³⁹則丁氏校本成稿當在此年前。這個時期的工作以校正《詩攷》沿訛、增補《詩攷》未備為主。盧文弨、丁杰等人長於考據校勘，為學謹嚴，如盧氏《增校詩攷》便曾兩易其稿，至乾隆四十五年始定稿。經他們校補後的《詩攷》已大體完備，所以此後的三家《詩》學著述從兩個方面繼續發展：其一是從校補《詩攷》轉向箋注《詩攷》，這包括嘉慶六年(1801)周邵蓮的《詩攷異字箋餘》和道光三年(1823)丁晏(1794–1875)的《詩攷補注》。葉裕仁(1809–1879)《詩攷箋釋》的成稿年份雖然無法確考，但以此書內容考量，加上葉氏與丁晏生卒年份相若，當同屬嘉道時期從校補《詩攷》轉向箋注《詩攷》的作品。

其二是變通《詩攷》的體例，另闢蹊徑，且各有側重。總計本文附錄所收清代三家《詩》學著述，明確以《詩攷》為書題的共八種。但有趣的是，其他著述的作者在書序裏，都不約而同述緒《詩攷》，以繼踵《詩攷》為志。如宋綿初在《韓詩內傳徵·敘》謂已於「王氏所遺者補之，略者詳之，疑似者去之，羣書相發明者，諸家有攷正者，旁搜博采，引證以窮其歸趣，久而成帙」。⁴⁰王初桐《齊魯韓詩譜·序》亦謂已「輯斯譜，以王伯厚所考為本而增益之，倫敘之，雖嘗鼎一臠，亦聊以見餽羊之意」。⁴¹黃位清《詩異文錄·自序》亦以《詩攷》「止有條目而無通釋」，於是「依經編序所見書之異文，其有通釋者綴於末」。⁴²諸書撰旨不一，但祖述《詩攷》之志卻相當一致。筆者認為這與清人推崇王應麟的學術成就有關。成書於乾隆晚年，代表乾嘉漢學古文經學正統思想的《四庫提要》，對王應麟的著作，幾乎都一致讚揚，如《提要》於《周易鄭康成註》云：「應麟能於散佚之餘，蒐羅放失，以存漢《易》之一綫，可謂篤志遺經，研心古義者矣。」於《詩攷》云：「古書散佚，蒐採為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易於為力。筆路藍縷，終當以應麟為首庸也。」於《漢制攷》云：「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據。較南宋末年諸人，侈空談而鮮實徵者，其分量相去遠矣。」於《困學紀聞》云：「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⁴³《提要》明

³⁹ 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二，頁15。

⁴⁰ 宋綿初：《韓詩內傳徵》，《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清乾隆六十年(1795)積學齋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敘〉，頁一上至一下。

⁴¹ 王初桐(纂輯)：《方秦志》，《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3》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傳抄本(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卷三，頁一〇上。

⁴² 黃位清：《詩異文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序〉，頁二上。

⁴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52，431，2122，3073。

顯以考據學的標準認同王應麟輯佚考證的成就，由此可證清代前期三家《詩》學著述多與《詩攷》有關，是受當時考據學風的影響。艾爾曼指出，清代考據研究成績斐然，原因之一是「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學術追求和風氣」。⁴⁴他舉清人繼承王應麟的學術工作為例說：

許多清代學者把王應麟看作自己的學術先驅。他們各自獨立地探討過王應麟開始性成果的不同側面。閻若璩曾著手詳注王應麟的名著《困學紀聞》，這一願望在他死後由何焯於1704年實現。《困學紀聞》目前通行的標準注本收錄了18世紀學者全祖望、焦循、馮登府的新成果，他們繼承了王應麟的《詩經》研究成果，糾正其中某些失誤。⁴⁵

上述增補校注《詩攷》的可以看做是繼往開來的著述，那些繼踵《詩攷》而另闢蹊徑的就是推陳出新的著述。可以說，王應麟的《詩攷》是清代研究三家《詩》學者不能繞過的課題。

《韓詩》研究在清代三家《詩》學中一枝獨秀

四十八種年份可考的著述中，《韓詩》類的共十九種，約佔四成，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六種年份不可考的著述，可見《韓詩》研究是清代三家《詩》學的熱點。《韓詩》類著述比較集中出現在兩個時期，其一是清代三家《詩》學的前期，即乾隆五十五年至嘉慶四年（1799）這十年間；其二是三家《詩》學的後期，即光緒十六年（1890）至二十五年（1899）這十年間。細考這兩個時期的著述，可以發現彼此相通的地方都是以輯佚為主，但成書原因則各有不同。

乾隆五十五年至嘉慶四年這十年間，三家《詩》學著述共七種，數量為各期之冠，除了王初桐的《齊魯韓詩譜》外，其餘都是《韓詩》類著述：趙懷玉校輯的《韓詩外傳》及《補逸》、宋綿初的《韓詩內傳徵》、沈清瑞的《韓詩故》、周宗杅的《韓詩外傳拾遺》、王謨輯的《韓詩內傳》、《韓詩翼要》、郝懿行的《韓詩外傳考證》等。《韓詩》最後亡佚，保存在其他典籍中的遺說較《魯詩》、《齊詩》多，在以輯佚為主的三家《詩》學前期，《韓詩》的研究自然一枝獨秀。今文經學的《韓詩》能夠在偏重古文經學研究的乾嘉時期得到學者重視，確實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然而細考這些著述的作者

⁴⁴ 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國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頁141-42。原文見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 205。

⁴⁵ 同上注，譯文，頁141-42；原文，p. 205。

與內容，可以發現《韓詩》在這個時候不過是學者鉤沈古學的對象，是他們運用輯佚考據方法治經的實踐而已，今文三家《詩》仍無法與古文《毛詩》相頡頏。盧文弨在乾隆四十五年撰〈增校王伯厚《詩攷》序〉已經指出：「諸君子之勤勤掇拾者，非欲申三家以抑毛而奪朱也。」⁴⁶「非欲申三家以抑毛」庶幾可以概括乾嘉諸儒掇拾《韓詩》遺說的旨趣。宋綿初的兒子宋保在《韓詩內傳徵·後識》裏這樣說：

毛公本通《韓詩》，後以其有未安，又見三家互有踳駁，因為詁訓，傳于其家。自後河間獻王得而獻之，立于學官。于時學者退《韓》而宗《毛》。……鄭康成注《禮》宗《韓》，箋《詩》宗《毛》，其不同下以己意，然亦間有用《韓》說者。……夫詁訓生于文字，文字起于聲音，古人之文，其音同音近者，義每不甚相遠。即《韓詩》以引而信之，觸類而求之，而聲音詁訓之道昭然矣。⁴⁷

宋保借毛亨、鄭玄（127–200）這兩位乾嘉時期古文經學家推崇的學者，強調屬今文經學的《韓詩》跟屬古文經學的《毛詩》關係密切，又以當時考據學的學術話語，從文字、聲韻、詁訓力證《韓詩》的價值。根據他的記述，這些話是從宋綿初那裏聽來的。如此大費周章，無非是要借當時的學術標準，證成其父掇輯《韓詩內傳》的價值。從宋保的話來看，當時居學術領導地位的仍是偏重東漢古文經學的漢學家，且終嘉慶一朝仍大體如此，這可以從臧庸輯《韓詩》遺說得到證明。

臧庸的《韓詩遺說》在嘉慶十四年（1809）成稿後一直只有傳鈔本，就中既無臧氏自序，亦無跋文，因此只能從臧庸治學的經過來推敲其輯錄的動機。考臧氏篤志漢學，學宗鄭玄。嘉慶六年，阮元為臧庸《孝經鄭氏解》輯本題辭云：「余知東序治鄭氏學幾二十年，有手訂《周易》、《論語》注等，所采皆唐以前書，為晉宋六朝相傳《鄭注》，學者咸所依據。」⁴⁸除了《孝經鄭氏解》外，臧氏尚輯有《論語鄭氏注》、《三禮目錄》。又曾訂補其高祖臧琳（1650–1713）所輯的鄭玄《六藝論》，凡此都是臧庸學本康成的表現。《後漢書·鄭玄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⁴⁹後世學者以鄭玄通《韓詩》之說即祖范史，且以為鄭氏初從張恭祖受《韓詩》，故其《三禮注》多用《韓詩》。王應麟即據此說，將鄭玄《三禮注》所見《詩》說定為《韓詩》。臧庸卻認為《三禮注》裏用的是《魯詩》，他曾就此致書陳壽祺，原札未見，只能從左海復函得其梗概：

⁴⁶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頁15。

⁴⁷ 宋綿初：《韓詩內傳徵·後識》，頁二上至二下。

⁴⁸ 臧庸（輯）：《孝經鄭氏解》，《知不足齋叢書》本（臺北：興中書局影印民國十年〔1921〕影印本，1964年），頁1。

⁴⁹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207。

前蒙手教，言鄭司農《詩箋》、《禮注》多用《魯詩》，誠覈誠確。……蓋鄭君先受《韓詩》，實已兼通三家，後乃治《毛氏》。《禮注》所據，未嘗專守一師也。……賈公彥、孔穎達、王應麟諸人以為鄭唯據《韓》，誠攷之不審，執事以為鄭惟習《魯》，必欲廢通《韓》之說，則亦矯枉而過其正也。⁵⁰

準此可知臧庸主張鄭玄惟習《魯詩》，這跟當時大部份學者的認知明顯不同，所以陳壽祺批評臧說矯枉過正。在臧庸看來，要貫徹他「鄭惟習《魯》」的主張，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將原本屬諸《韓詩》的《三禮注》從《韓詩》遺說裏剔除。今本《韓詩遺說》沒有一條出自《三禮注》，這是臧庸對王應麟《詩攷》最大的改動。他在《訂謔》裏還訂正了十二條《詩攷》譌誤的文字，其中《詩攷·韓詩》定〈燕燕〉一詩為衛定姜歸其娣之作，臧氏案曰：「鄭注〈坊記〉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毛詩》為莊姜。』則此注本《魯詩》說，王氏意以為《韓詩》，亦誤。」⁵¹這樣看來，臧庸之撰《韓詩遺說》，除了增訂遺說外，更重要的工作，是將《三禮注》從《詩攷·韓詩》裏削除，以還鄭玄《詩》說的本貌。如果這個推論沒有錯的話，臧庸之重輯《韓詩》遺說，跟其尊崇鄭學的經學思想不無關係。對他來說，輯錄《韓詩》只不過是他研究東漢古文經學的手段而已。

光緒十六至二十五年這十年是清代三家《詩》學的後期，這個時期的著述共五種，其中《韓詩》類著述佔四種，這是清代經歷太平天國之亂後，三家《詩》研究重上軌道的時期。道光二十三年(1843)，陳喬樞的《三家詩遺說攷》、《詩經四家詩異文攷》出，學者譽為三家遺說異文無出其右。晚清學者能有補輯《韓詩》之作，實拜發現新材料所賜。光緒六年(1880)，楊守敬(1839-1915)在日本訪得唐釋慧琳(737-820)《一切經音義》。⁵²其後，黎庶昌(1837-1897)、羅振玉(1866-1940)在日本分別發現原本卷子《玉篇》殘卷，且各自集佚成書。清末學者得覩這兩部失落中土的古籍後，競相研究，影響晚清經學、小學甚鉅。陶方琦在〈倭刻唐人卷本《玉篇》零部跋〉中形容他看到這兩部佚籍是「希世之寶，未可多得」。⁵³陶氏後來據此輯補臧庸《韓詩遺說》而成《韓詩遺說補》，自序云：「近歲得見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希麟《續音義》及日本新刻《玉篇》零部、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次第補輯《韓詩》一百五十餘條，其

⁵⁰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四，頁五五上至五五下。

⁵¹ 臧庸：《韓詩遺說》，《百部叢書集成》影印《靈鶴閣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訂謔》，頁七上。

⁵² 楊守敬云：「唐沙門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余初至日本，有島田蕃根者持以來贈，展閱之，知非元應書，驚喜無似。」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鄰蘇園刻本，卷四，頁二〇上。

⁵³ 陶方琦：《漢孳室文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八年(1892)徐氏鑄學齋刻本，卷四，頁一二上。

義多臧氏未采。」⁵⁴此外，顧震福「據原本《玉篇》、《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等書，詳為採輯」，⁵⁵成《韓詩遺說續攷》四卷。龍璋（1854—1918）《韓詩》一卷，亦「從卷子本《玉篇》及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希麟《續義》、韓孝彥《四聲篇海》等書，輯錄而成」。⁵⁶可見新材料的發現是促進晚清三家《詩》學重新側重《韓詩》的主因。

嘉道年間的三家《詩》學重視異文研究

嘉慶十五年（1810）至道光二十九年這四十年裏，清代三家《詩》學著述共二十種，平均每十年便有五種著述問世，這是三家《詩》研究穩定發展的時期。從乾隆十九年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刊刻一直到嘉道之際，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已經超過五十年。前期學者的工作集中在輯佚上，到了嘉道年間，三家《詩》學一方面繼承前期的輯佚工作，有嚴可均（1762—1843）的《韓詩輯編》、錢攻的《〈韓詩內傳〉並〈薛君章句〉攷》、馮登府的《三家詩遺說》、陳喬樞的《三家詩遺說攷》等。另一方面由於輯佚方法擴充，三家《詩》材料相當可觀，嘉道年間的三家《詩》學者於是在輯佚以外另闢研究方向，集中研究異文是這個時期的重點，著述包括李富孫的《詩經異文釋》、黃位清的《詩異文錄》、陳喬樞的《詩經四家異文攷》等，其中以馮登府的著述最多，除了《三家詩異文疏證》外，尚有成稿年份不能確考的《三家詩異文釋》和《三家詩異字詁》兩種。

異文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注明異文出處，辨析異文之間在形、音或義上的關係。例如《詩經四家異文攷·周南·關雎》「參差荇菜」一句，《毛詩》「荇」作「荇」，陳喬樞案曰：「《爾雅·釋草》：『荇，接余，其葉苳。』《爾雅》是《魯詩》之學，則作『荇』者，《魯詩》異文也。」⁵⁷陳氏據臧庸以《爾雅》為《魯詩》之學，⁵⁸故以「荇」字為《魯詩》異文。又例如《三家詩異文疏證·韓詩·汝墳》「惻如調饑」句，《毛詩》「惻」作「怒」，馮登府案曰：「《說文》『惻』讀與『怒』同，段氏玉裁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怒、惻通用。』」⁵⁹《詩》四家各有傳本，不同傳本以不同的文字代表同一個詞，

⁵⁴ 同上注，頁一〇下。

⁵⁵ 張壽林：〈《韓詩遺說續考》提要〉，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447。

⁵⁶ 葉啟勳：〈《韓詩》提要〉，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449。

⁵⁷ 陳喬樞：《詩經四家異文攷》，《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刻本，卷一，頁二下。

⁵⁸ 陳喬樞《魯詩遺說攷·自序》云：「《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為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為《魯詩》，允而有徵。」見陳喬樞：《三家詩遺說攷》，《經解續經解毛詩類彙編》影印《皇清經解續編》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序〉，頁三下。

⁵⁹ 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經解續經解毛詩類彙編》影印《皇清經解》本，卷一四〇七，頁二下。

於是產生了異文，因此辨析異文本來應該屬於研究客觀語言事實的工作。可是在傳統小學仍為經學附庸的清代，小學研究往往具有經學意義。賀廣如指出馮登府在《三家詩異文疏證》中所做的工作是「呈現異文中的正字與假字，並進一步疏證其義」，並認為馮氏「雖歸納出三家與毛各有不同的用字趨向，但並未對此一現象做任何有關價值方面的評說」。⁶⁰在賀氏看來，馮登府所做的工作是客觀的。可是筆者仔細翻閱《疏證》，卻發現馮氏有不少像「較毛為勝」、「是韓較毛為勝」、「較毛義長」之類明顯具價值判斷的案語。⁶¹筆者認為馮登府正是透過辨析《毛詩》與三家《詩》的異文，強調「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字」的現象，以訓詁的方法，突出三家《詩》的經學價值，而其重要的憑借是許慎的《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引《詩》用字多與《毛詩》異，馮登府辨析異文時，往往據《說文》得出三家用正字、本字，《毛詩》用假字的結論。例如《三家詩異文疏證·韓詩·泉水》「祕彼泉水」，《毛詩》「祕」作「𦉳」，馮氏案曰：「《說文》『𦉳』字下引作『泌』。『泌』是本字，當是齊魯說。」又《韓詩·碩人》「鱣鮪鱣鱣」，《毛詩》「鱣」作「發」，馮氏案曰：「『鱣』亦同『鮪』。《說文》引《詩》作『鮪鮪』，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字也。」又《韓詩·有杕之杜》「逝肯適我」，《毛詩》「逝」作「噬」，馮氏案曰：「《說文》有『逝』無『噬』，然則『逝』本字。」又《魯詩·揚之水》「素衣朱綃」，《毛詩》「綃」作「褰」，馮氏案曰：「《說文》：『綃，生絲也。』作『綃』為正。」⁶²何以用字與《說文》相合即可判斷為正字呢？這與當時學者普遍推崇《說文》的風氣有密切的關係。《說文》本屬文字之學，但在尊崇漢學、推崇許鄭的清代中葉，學者卻以之為解經的訓詁依據，以《說文》為本字、本義的津梁，段玉裁在其《說文解字注》中即反覆強調《說文》用本字。⁶³在這樣的學術環境，經文多本字的三家《詩》較諸經文多借字的《毛詩》，明顯更容易與《說文》收錄的本字本義互相發明。《詩》尚三家的魏源在《詩古微》裏即藉「《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來強調三家《詩》與《說文》關係密切。⁶⁴然而對專治《毛詩》的陳奐來說，這些看法並不正確。

⁶⁰ 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頁325。

⁶¹ 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卷一四〇七，頁一〇上、一二上、三八下。

⁶² 同上注，卷一四〇七，頁八上；同卷，頁一三上；同卷，頁二〇上；卷一四〇八，頁一九上。

⁶³ 段氏《說文》學其中一個特點是以為《說文解字》必用本字，例如《說文·大部》「查，奢查也」下段《注》云：「漢人作《傳》、《注》，不外轉注、段借二者，必得其本字而後可說其段借，欲得其本字，非許書莫由也。」又如《說文·阜部》「陟，登也」下段《注》云：「許此作『登』，不作『升』者，許書說解不用段借字也。漢人用同音字代本字，既乃不知有本字。」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一〇下，頁五下；卷一四下，頁四上。

⁶⁴ 魏源：《詩古微》，二十卷本，載《魏源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頁125。

陳奐的《詩毛氏傳疏》在清代《毛詩》學著述中以墨守《毛詩》、《毛傳》，貶抑三家《詩》而著稱。在陳氏看來，《毛詩》是古文，其經字多假借的現象只不過反映了「古人字少，義通乎音」的事實，⁶⁵至於三家《詩》多本字的現象，陳氏另有見解。考王引之（1766–1834）《王文簡公文集》中收錄了一通王氏致陳奐的復函云：「尊說又言，三家《詩》多用本字，疑以己意讀經，不必盡是師傅本子不同，如司馬遷以訓詁字代經之比。」⁶⁶從復函看來，陳奐曾經懷疑三家《詩》多用本字的現象，可能是經師在流傳三家《詩》的過程中，「以己意讀經」的結果，情況就好像史遷撰寫《史記》時，以今字易古字一樣。在陳氏眼中，《毛詩》多用借字母庸置疑，但三家《詩》裏那些異於《毛詩》的所謂本字未必盡是師傅。筆者認為陳奐的這個看法，是他在清人尊崇《說文》的學術環境，為了維護《毛詩》、《毛傳》的經學地位而提出來的。陳氏既然無法改變《毛詩》多借字的事實，只好懷疑與《說文》本字本義多所發明的三家《詩》經文是否本來如此。如果他能夠論證三家《詩》經文本字是經師改經之字，非三家《詩》經文原貌，那麼三家《詩》經字與《說文》本字的關係便不見得如此密切。如果三家《詩》多本字是傳經者「以己意讀經」，易字訓釋的結果，那麼三家《詩》經文的價值便很成疑問。有了這一點認識，我們便明白馮登府在《疏證》裏據《說文》強調三家多正字的做法，除了交代三家《詩》經字多用本字這個事實外，還有其經學上的目的——突出三家《詩》的價值。可以說馮氏藉著異文的研究，認識到三家《詩》的價值，因而在嘉慶十八年成稿的《疏證》裏初步透露了三家勝《毛詩》的想法，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成稿的《三家詩遺說》，馮氏更是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張揚三家《詩》的立場。

在嘉道年間與馮氏看法接近的學者不在少數，例如錢坫《〈韓詩內傳〉並〈薛君章句〉攷》卷首有杜燾（1764–1858）寫於道光元年（1821）的〈序〉，其說曰：

漢儒釋經，精微深造，不可泯沒，而其書之盛衰顯晦，各有其時焉。古來傳《詩》者四家，惟韓、毛為顯門之學。毛未著而韓盛行，毛既盛而韓遂廢。……予嘗以為《韓詩》之不可廢者有五：夫詩教傳於子夏，惟毛公、韓氏同出西河，自唐以來均享聖廡，源流既正，著錄並崇，一也；世子受爵毀主，合食黍離，閔於伯封賓筵，悔於睿武考據，是資裨繫特重，二也；惕惕悅人之形，濺濺流水之貌，葦竹為綠葦、唐棣為夫移，證之許郭，訓詁足據，三也；潔濁本於潔圭，斯棘由於斯初，衣褐出於衣襜，卓彼起於蒞彼，

⁶⁵ 《詩毛氏傳疏》刻成後，同年並有《毛詩說》一卷成書，分十七例，是陳奐為《傳》作《疏》後，為了供「學者省覽」而整理歸納出來的心得，其中「假借說」指出「凡字必有本義，古人字少，義通乎音」。見陳奐：《毛詩說》，《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武林愛日軒刻本，頁一一上。

⁶⁶ 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高郵王氏遺書》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四，頁五上至五下。

韓為正字，毛為假借，四也；罄天之妹，大明著其訓；鶴鳴于埳，東山通其解，韓詩苟失毛義，莫尋其相為表裏，五也。⁶⁷

杜堯以師承、經文、用字、詩義諸方面論證《韓詩》當與《毛詩》並駕齊驅，〈序〉末又云：「《韓詩》薛義，粲然復明於世，豈非盛衰顯晦，各有其時。」⁶⁸言下之意，《毛詩》之所以盛而顯，亦不過得「其時」而已。陳喬樞在《詩經四家異文攷·自敘》裏更指出：「四家之《詩》，其始口相傳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各用其鄉音，故有同言而異字，同字而異音者。然而古人文字聲音訓詁通假之源，未始不可於彼此同異之間觀其會通，觸類而引伸之，足以舉一反三焉。」魯齊韓毛四家本來可以觸類會通，並無高下之別。他又認為「三家《詩》亡，說經者之不幸也。三家訓詁大義，多足與《毛傳》相發，而《鄭箋》與《毛傳》異者，往往本之三家」。⁶⁹可見三家《詩》學從乾嘉時期發展到嘉道之際，經過了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為清人認同。從早期純粹輯佚以存古學，逐漸發展到研究輯佚所得的材料。學者從研究異文所得，開始認識三家《詩》經文遺說的價值。從乾隆時期盧文弨仍申述「非欲申三家以抑毛」的立場，到嘉道之際，已經有學者同情「三家《詩》亡」是「說經者之不幸」，更有三家勝《毛詩》的主張，凡此都顯示了清代《詩經》研究在嘉道之際由尊《毛詩》漸次轉向重三家。

道光時期三家《詩》學出現了微言大義的研究

道光時期出現了兩部比較重要的三家《詩》學著述。陳壽祺、陳喬樞的《三家詩遺說攷》總結了乾嘉以來古文經學家輯佚考據的成果。此書發軔於陳壽祺，成書於陳喬樞，從屬稿到成書前後綿歷二十三年。有清一代，秉承王應麟《詩攷》之志而從事三家《詩》輯佚者不乏其人，而陳氏父子堪稱集其大成，其後治三家《詩》者，鮮能不取資陳書。江乾益總結陳氏父子三家《詩》學的成就說：「以三家詩之輯佚，陳氏父子之著最為宏富詳瞻〔瞻〕，既躡前人之作於前，而凡載籍之述三家者，靡不在蒐羅之中。」⁷⁰洵非溢評。但陳氏父子的貢獻終究在輯佚考據上，在西漢今文經學備受學者重視的道光時期，魏源的《詩古微》才是首部以張揚三家的立場，標舉微言大義，經世致用的三家《詩》學著述，稱得上是清代三家《詩》研究中的鑿空之作。

《詩古微》有道光九年（1829）的二卷初刻本和道光二十年的二十卷二刻本。魏源在二刻本的〈序〉裏解釋「詩古微」的意思說：

⁶⁷ 參見《〈韓詩內傳〉並〈薛君章句〉攷》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卷一〈序〉，頁1。

⁶⁸ 同上注，頁2。

⁶⁹ 陳喬樞：《詩經四家異文攷》，卷一〈序〉，頁一下、二上。

⁷⁰ 江乾益：〈陳壽祺父子三家詩遺說研究〉，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30號（1986年6月），頁281。

《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于來世也。蓋自「四始」之例明，而后周公制禮作樂之情得，明乎禮、樂，而后可以讀《雅》、《頌》；自迹熄《詩》亡之誼明，而后夫子《春秋》繼《詩》之誼章，明乎《春秋》，而后可以讀《國風》。⁷¹

他在咸豐五年(1855)寫在龔橙(1817-?)批校本上的識語，指出自王應麟以來，輯錄三家遺說的學者「顧皆案而不斷，無以發《風》、《雅》、《頌》之大誼，賦、比、興之微言」，所以他「沉潛研究，十載於茲，突奧幽深，靡不洞啟，憤悱洞關，若翼若相，神其來告，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凡得書二十卷。竊冀將來庶與《毛詩》並學宮」。⁷²《詩古微》發揮三家《詩》微言大義之旨相當明顯，這跟他的老師常州《公羊》學派奠基者劉逢祿的看法很接近。⁷³劉氏治《詩》初宗《毛詩》，後好三家，其《詩古微·序》曰：

世之說者顧曰：三家《詩》多述本事，猶之不修之《春秋》也。……果爾，則請以《春秋》義法核之。《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息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⁷⁴

劉氏拿《公羊》學中「大一統」、「通三統」的思想比附《詩經》，以《春秋》義法解《詩》。比照魏劉二序，可謂如出一轍。蓋魏源秉持的同樣是「《詩》亡然後《春秋》作」的看

⁷¹ 魏源：《詩古微》，頁99。

⁷² 同上注，頁737。案：此識語影自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的《詩古微》龔橙批校本。

⁷³ 案：嘉慶十九年魏源從劉逢祿學《公羊》，見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頁53。又案：乾嘉之際，隨著漢宋調和的呼聲日張，部份學者認識到古文經學考證煩瑣、無益經世的弊病，開始注重通經致用，而以「經術緣飾治術」的西漢今文經學正好切合這個學術潮流，其中《公羊》學尤為晚清今文經學的大宗，其首倡者則常州府武進人莊存與，其奠基者則莊氏外孫劉逢祿。莊存與治學不囿漢宋，兼容古今，著述後來結集為《味經齋遺書》，其中《春秋正辭》一書專門發揮《春秋》中的微言大義，最為重要，因為《春秋》三傳裏，《公羊傳》最能體現《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後來由他的外孫劉逢祿繼承並發揚乃祖之學，著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因為莊、劉皆為常州人，所以學者稱之為「常州學派」，而他們研治的經典以《公羊》一經用力最勤。湯志鈞認為「清代今文經學到了劉逢祿，對儒家各經有了比較全面的闡述，也有了比較系統的理論，劉逢祿可說是清代今文經學的奠基者」。見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74。

⁷⁴ 魏源：《詩古微》，頁729-30。

法，並以《公羊》義法，鈎抉《詩》中的微言大義。二刻本《詩古微》寫成的那一年，鴉片戰爭(1840–1842)爆發，前此，清朝內部已經矛盾叢生。魏源生當亂世，他說《詩》講求微言大義，正是要以儒家經典作其求變學說的憑藉。魏源《詩》學中的今文經學思想受劉逢祿影響甚大，但劉逢祿強調的是「大一統」，魏源關心的是西漢三家《詩》學如何有助闡明他以「變」救時的思想。他在〈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敘〉一文中說：

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於東京；東京典章制度，絕於隋、唐；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於魏、晉；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質再世而必復，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故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⁷⁵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于道」，出《論語·雍也》篇。由齊變魯，由魯變道，道是王道，越變越好，由急功利、尚刑政變為尚禮義，最終求變而致王道。⁷⁶但魏源有不同的理解，他看重的是「變」字，而他所說的變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第一層是學術之變，即由詁訓聲音之學變為東漢典章制度之學，再由典章制度之學變為西漢微言大義之學。回復到西漢經學有甚麼好處？西漢經學有微言大義，是其求變革新的理論依據，這就第二層的變以經世。陳耀南《魏源研究》專闢一節論魏源在《默觚》裏如何用《詩》諫世，他統計《默觚》引《詩》共一百八十三次，「其中二《雅》最多，尤以《大雅·板》詩，共引14次，『怨誹而不亂』的《小雅》，又較《大雅》略多」，陳氏認為「西漢今文家以《三百篇》當諫書，這傳統到了魏源，是繼承而又擴大了」。⁷⁷魏源指出學術回復到西漢經學，便能通達「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的道，這是把經術和治術結合為一的觀念。湯志鈞說：「魏源撰《書古微》、《詩古微》，『使《詩》、《書》復於西漢』，言三統以明變革。他用的是今文『微言大誼』，而想望的又是政治『革新』，他『以經術為治術』，欲『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⁷⁸可謂一矢中的。

⁷⁵ 魏源：《古微堂外集》，載《魏源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頁136–37。編校者以為「故事」疑作「政事」。

⁷⁶ 朱熹《集注》云：「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義，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90。顧炎武《日知錄》云：「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見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03。

⁷⁷ 陳耀南：《魏源研究》（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頁88。

⁷⁸ 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頁125。

魏源要將經術回復到西漢經學，必先揭示西漢經學優於東漢經學的地方，然後才能為其變革的經世思想尋找理據。他在《詩古微》裏所做的工作，就是張皇三家。〈齊魯韓毛異同論上〉先引末學矯誣三家之說有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考也。」魏源一一破其疑，起其墜。首先據《水經注》說「《韓詩》有序明矣」，據〈上林賦〉注說「《齊詩》有序明矣」，據《列女傳》說「《魯詩》有序明矣」。更提出三家同源之論云：「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于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⁷⁹另外，又以《經典釋文》所引《毛詩》傳授源流異說，駁斥《毛詩》出子夏的成說：

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為出荀卿，一以為不出荀卿；一以為河間人，一以為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⁸⁰

魏源認為《毛詩》之最不可信者在《毛序》，而《毛序》其實非傳自子夏，乃衛宏所作。〈毛詩義例篇上〉云：「夫《毛》之釋《詩》者非《傳》乎？其統《傳》者非《序》乎？輔《傳》者非《箋》乎？攷《詩序》之說，不見于《史記》、《漢書》，即《毛傳》亦絕無『序』字。」⁸¹魏源從今文經學的立場，力闢《毛序》偽作，非子夏所傳，此說對《毛詩》學派可謂迎頭痛擊。誠如梁啟超說：「道光末，魏源著《詩古微》，始大攻《毛傳》及大小《序》，謂為晚出偽作。其言博辯，比於閻氏之《書疏證》，且亦時有新理解。」⁸²

清初閻若璩(1636–1704)的《尚書古文疏證》確證了《古文尚書》為偽作，使宋明理學家賴以立說的「十六字心傳」頓失依傍，漢學家於是乘勢奮起。晚清魏源的《詩古微》力證《毛序》之偽，則是同室操戈，從漢學內部恢宏今文《詩》學，揭示三家《詩》學在致用方面的價值。可以說魏源試圖扭轉乾嘉以來古文《毛詩》獨尊的局面，而《詩古微》正是這種嘗試的成果，這對其後《詩經》研究者影響極大，王先謙(1842–1918)的《詩三家義集疏》即是在服膺魏說基礎上集清代三家《詩》學大成的殿軍之作。但必須指出的是，魏源在張揚三家的同時，並沒有完全否定《毛詩》的價值。賀廣如認為「默深雖極力闡揚三家大義，但卻無意貶抑《毛詩》地位，以為四家《詩》說應可並行不悖，同採於學宮」，⁸³這正是魏氏在龔橙批校本《詩古微》上題寫的識語「冀將來庶與《毛詩》並學宮」的意思。

⁷⁹ 魏源：《詩古微》，頁123–24。

⁸⁰ 同上注，頁127。

⁸¹ 同上注，頁157。

⁸²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76。

⁸³ 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9年），頁132。

咸同以後三家《詩》學進入總結的階段

咸豐、光緒二朝出現了兩部以經疏體例注釋三家《詩》經文詩說的著述，其一是咸豐四年周曰庠的《詩經三家註疏》，其二是始撰於光緒年間，成書於民國初年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詩經三家註疏》未經刊行，但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記，是編「僅殘存二卷，全書卷數，已不可知。現存殘卷，起於《周南·關雎》，止於《衛風·二子乘舟》」。「章句文字，仍從《毛傳》，而以三家異文，注之正文之下」。「其有疏解，則另加疏字以別之，皆用雙行，以為標識」。「旁徵遠引，曲暢其說，於三家遺義，攷核甚詳」。⁸⁴可知周氏充分掌握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後以經疏體例疏解三家異文遺義。可惜此稿殘闕不全，且久庋書庫，知之者寡，其影響遠遜於《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一書屬稿於王先謙江蘇學政任上（光緒十一至十四年，1885–1888），⁸⁵至民國五年（1916）成書，前後綿歷近三十年。此後學者論及此書，屢稱其集有清三家《詩》學的大成。王氏在序中說明撰集緣起時亦曰：「近二百數十年來，儒碩踵事搜求，有斐然之觀，顧散而無紀，學者病焉。余研覈全經，參匯眾說，於三家舊義采而集之，竊附己意，為之通貫。」⁸⁶可見王氏亦以總結一代三家《詩》研究成果自許。那麼王先謙在《集疏》裏到底總結了哪些成果呢？清代三家《詩》研究從乾隆十九年范家相刊刻《三家詩拾遺》起計算，至民國五年《詩三家義集疏》刊刻止，有超過一百六十年的歷史，此間實績舉其要者約有四端，而此四端皆為《集疏》采集貫通：其一是豐富了三家《詩》的輯佚材料。清人競相鉤沈佚文遺說，著述湧現，結果自然是三家《詩》輯佚成果斐然可觀。這使王先謙一方面可以利用陳喬樞《三家詩遺說攷》的材料，將「其文其義，散具篇章」；⁸⁷一方面可以吸收如顧震福《韓詩遺說續攷》等利用新見佚籍補綴的材料。

其二是改進了三家《詩》輯佚材料歸類的方法。王應麟的《詩攷》先將三家《詩》輯佚材料分而別之，按「韓詩」、「魯詩」、「齊詩」為次，然後各以《詩經》篇名為綱，再以《詩》句為領，把輯錄所得歸類。這種方法的缺點是無法處理那些家數未明的材料，於是王應麟只好另立「詩異字異義」一卷以歸類。有見及此，范家相改變了《詩攷》以魯、齊、韓分類的方法，改以三百篇為綱，於篇目下具列三家遺說，於家數判然可考者標明為《魯詩》、《齊詩》或《韓詩》，於家數不可考者則泛屬三家，這就避免

⁸⁴ 張壽林：〈《詩經三家註疏》殘卷提要〉，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439。

⁸⁵ 據吳格：〈《詩三家義集疏》點校說明〉，載王先謙（著）、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

⁸⁶ 同上注，〈序〉，頁1。

⁸⁷ 同上注，〈例〉，頁5。

了輯佚材料無法歸類的問題。《詩三家義集疏》即採用以三百篇為綱編次三家《詩》輯佚材料的體例。

其三是擴充了三家《詩》輯佚的方法。根據賀廣如的研究，三家《詩》輯佚方法從南宋王應麟開始，一直到嘉道時期的馮登府，已經發展出「直引」、「師承」、「推臆」三法。⁸⁸陳喬樞《三家詩遺說攷·敘》更詳細敘述了三家《詩》傳授的經過以及由此推衍考證佚文、採摭異義的方法。比方來說，《齊詩遺說攷·敘》以後蒼治《齊詩》，慶普雖以《禮》名家，但由於他是后蒼弟子，故其《詩》說當屬《齊詩》。曹充持《慶氏禮》，《詩》說即屬《齊詩》，而曹褒是曹充兒子，《後漢書》記載的曹褒解《詩》即本《齊詩》。因此《齊詩遺說攷》「奚斯所作，孔曼且碩」條下錄《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並以此為《齊詩》說。⁸⁹姑勿論這種推論是否合理，清人確實廣衍此法，採摭遺說。王先謙也不例外，其《詩三家義集疏·例》更逐錄《三家詩遺說攷·敘》全文，「藉明梗概」。⁹⁰

其四是憑藉動搖《毛傳》、《毛序》的地位，確立張揚三家《詩》的經學立場，其代表人物是魏源。《詩三家義集疏》張揚三家的解經取向即源於魏源的《詩古微》，而指陳《毛詩》之失則較魏氏為甚。《詩三家義集疏·序》云：「《詩》則魯、齊、韓三家立學官，獨毛以古文鳴，獻王以其為河間博士也，頗左右之。劉子駿名好古文，嘗欲兼立《毛詩》，然其〈移太常書〉，僅《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三事而已。……蓋毛之詁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據為獨得之奇，故終漢世少尊信者。」⁹¹王氏以為《毛詩》不可尊信，原因有二：（一）《毛詩》雖號為古文經，但非在魯恭王壞孔子宅時所得古文經書之列，即便偏好古文如劉歆者，亦不敢於譴責太常博士固殘守缺的〈移讓太常博士書〉裏提及《毛詩》；（二）《毛詩》來歷不明，託名子夏。王氏在《詩三家義集疏·例》中引而申之曰：「《毛詩》則詭名子夏，而傳授茫昧，姓名參錯，其大旨與三家歧異者凡數十，即與古書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為鄭偏好。」又云：「秦漢之際，經亦幾亡，《毛傳》乘隙奮筆，無敢以為非者，古文勃興，永為宗主。幸三家遺

⁸⁸ 根據賀氏的定義，「所謂直引，便是某書的作者由於及見三家《詩》未亡佚時之原貌，故直接引述三家《詩》中原來的內容」；「師承」指「就諸書作者的學術背景，如師承或家學等淵源，便可推敲其人與三家《詩》的種種關連，並進一步論斷其說應屬三家《詩》中的某一家」；「推臆」則是以「直引法及師承法為基礎，凡遇有不同於《毛詩》者，便先歸入三家《詩》的大範疇中，之後，再依次對照以直引法輯佚出的《韓詩》內容，或以師承法輯佚而成的內容，遇有合者，便逕自歸入相合的某家，若未遇合者，則仍泛屬於三家《詩》，並不分別屬之任何一家」。見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頁314，315，322。

⁸⁹ 陳喬樞：《齊詩遺說攷》，卷一一，載《三家詩遺說攷》，頁七下。

⁹⁰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例〉，頁5。

⁹¹ 同上注，〈序〉，頁1。

說猶在，不可謂非聖經一綫之延也。」⁹²言下之意，《毛詩》之所以為鄭玄青睞，為之作《箋》，只是「以古文之故」，而鄭玄之好古文，又是受「古文勃興」的時代風尚影響。幸而三家《詩》遺說尚能考辨，否則聖人經說便因《毛傳》乘虛而入而湮沒無聞。王先謙在《集疏·例》中更幾乎引錄了前引魏源〈齊魯韓毛異同論上〉整篇文章，重申《毛詩》不可據信的觀點，並加案語曰：「魏說明快，足破近儒墨守陋見。」⁹³

由此可見，清人在三家《詩》研究上取得的幾個重要成果都給王先謙總結到《集疏》裏。這也反映了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在咸同以後漸趨成熟，已經有足夠的條件與《毛詩》學抗衡。《毛詩》、《毛傳》自東漢鄭玄作《箋》，唐代孔穎達作《疏》，獨尊之勢，牢不可破。殘闕嚴重的三家《詩》學與經、傳、箋、疏俱備的《毛詩》學比較，可謂有霄壤之別。幸而清人鉤沈古學，扶微興廢。輯考三家到了陳喬樞而粲然大備，發揚三家到了魏源而旗鼓大張。王先謙則發凡起例，以經疏體例「參匯眾說」並「為之通貫」。《集疏》全書經文章句一依《毛詩》，經文下以「注」大字單行列三家詩說異文，注文下以「疏」小字雙行列詩說異文出處以及王氏疏解等。至此，三家《詩》學終於出現一部可以與《毛詩》比肩的經疏著述。這既是《集疏》極具價值的貢獻，也是清代三家《詩》學發展成熟的表徵。

結語

本文根據四十八種成書或成稿年份可考的清代三家《詩》學著述及六十五位籍貫可考的作者，嘗試結合時間與地理分布的因素，描述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為敘述方便，上文論及諸項特色時各有側重，實則諸項之間層層相扣，互為因果。

清代三家《詩》學著述的作者主要來自江蘇、浙江兩省，以江浙為主的江南地區約佔作者人數的七成，可見江南地區是清代三家《詩》學的中心。江南地區既是乾嘉以來提倡考據實證學風的重鎮，亦是考據學家輩出、名著湧現的輻輳。講求考據實證的前提是充分掌握文獻材料，因此江南地區的學者特別重視鉤沈古學。輯佚工作始終在清代三家《詩》學中佔據重要的位置，這除了因為三家《詩》經文詩說散佚嚴重，必須掇拾爬梳才能重新研究外，清代三家《詩》研究工作始終集中在江南地區這個地理因素也起了關鍵的作用。

清人重視鉤沈三家《詩》佚文遺說，因此開三家《詩》輯佚風氣之先南宋王應麟的《詩攷》備受推崇，增補校注《詩攷》成了清代三家《詩》研究中重要的課題。另外由於輯佚方法的擴充，學者開始在《詩攷》以外，另闢蹊徑。《韓詩》在三家《詩》中最後亡佚，保存在其他典籍中的遺說又較《魯詩》、《齊詩》為多，在以輯佚為主的乾嘉時期，《韓詩》自然成為學者首先鉤沈的對象。光緒初年，《慧琳音義》、原本《玉篇》殘

⁹² 同上注，〈例〉，頁5，17。

⁹³ 同上注，頁16。

卷、《玉燭寶典》等久經散佚的古籍陸續從日本傳回中國，引起了學者的關注，補綴《韓詩》的著述紛紛面世，這又證明了輯佚工作由始至終在三家《詩》學中佔據重要的位置。

競相考輯的結果是輯佚材料斐然可觀，碩果纍纍的三家《詩》材料為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嘉道之際，三家《詩》學開始由輯佚轉向異文的研究。在「家家許鄭」的清代中葉，學者好以《說文》為本字、本義的津梁。在好講本字本義的學術環境，三家《詩》學者藉著比照三家《詩》與《毛詩》異文，發現三家的經文更能與《說文》收錄的本字本義互相發明。他們利用研究異文所得，開始認識三家《詩》經文遺說的價值，逐漸出現了標榜三家的傾向。道光年間，出現了首部以張揚三家的立場，標舉微言大義、經世致用的三家《詩》學鑿空之作《詩古微》。魏源在《詩古微》力證《毛序》之為偽，從漢學內部恢宏今文《詩》學，揭示三家《詩》學在致用方面的價值，試圖扭轉乾嘉以來古文《毛詩》獨尊的局面。

清代早期三家《詩》學屬於純粹輯佚以存古學，「非欲申三家以抑毛」是學者普遍的立場。但輯佚材料越見豐富之際，學者亦漸次從梳理研治輯佚材料所得，認識三家《詩》經文遺說的價值，出現了由尊毛轉為重三家的變化。最後在光緒年間由王先謙總結前人——特別是清人——研治三家《詩》學的成果，其《詩三家義集疏》以經疏的體例替三家《詩》經文詩說作疏，使三家《詩》注疏俱備，足與《毛詩》平分秋色。

後記

拙文初稿收錄了六十八種清代三家《詩》學著述，⁹⁴送審後承本刊評審人惠示意見，匡正不逮，經筆者考證後增補了兩種著述，⁹⁵謹致謝忱。其中一位評審人更賜告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房瑞麗博士的學位論文〈清代三家詩研究〉有附錄〈清代三家詩著述目錄考〉一篇，囑作參考。筆者其後在「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上讀到房文，房文在2007年4月寫成，時間稍晚於拙文初稿。讀後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拙文以量化統計的方法探討清代三家《詩》學的發展，房文則集中選取若干三家《詩》名著加以分析，各有側重，故詳略有異。其中論及王應麟《詩攷》對清代學者在三家《詩》輯佚工作的影響，以及清代三家《詩》輯佚成果的論點，則彼此頗相一致，讀者可以比較參考；（二）筆者考證後據房文附錄〈清代三家詩著述目錄考〉增補了五種著述，⁹⁶

⁹⁴ 拙文初稿為筆者博士論文〈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研究〉的一部份，在2006年12月提交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

⁹⁵ 增補的兩種著述是趙紹祖《校補王氏詩考》、陶方琦《魯詩故訓纂》。

⁹⁶ 增補的五種著述是曾廷枚《毛齊魯韓四家詩異同》、李貽德《詩考異》、郭慶藩《詩異文考證》、黃啟興《詩考》、李德淑《毛詩經句異文通詁》。至於拙文收錄的丁杰《詩攷》校本、郝懿行《韓詩外傳考證》、周曰庠《詩經三家註疏》、顧觀光《韓詩外傳逸文》、龍璋《韓詩》、皮嘉祐《韓詩疏證》共六種著述，則又房氏附錄所未收。

同時訂正了房文附錄部份資料。⁹⁷ 增補的著述只影響正文的統計數據，正文論點基本不變。

附錄：清代三家《詩》學知見著述繫年表

凡例：

1. 本表將四十八種成書成稿年份可考的三家《詩》學著述繫年，二十七種年份不可考者則於表末附載。
2. 「成書」指刊刻成書。由於部份著述有超過一種版本，本表根據最早的版本繫年。「成稿」則指著述未經刊刻，只有稿本或鈔本，本表根據其成稿的年份繫年。
3. 本表分兩欄，先列年份（格式依次為帝號、年份、干支、西元紀年）；次列三家《詩》學著述，先著錄作者、生卒年、籍貫、書名；然後另起新行縮入兩格，以「案」字提領考證資料。

年 份	三家《詩》學著述繫年及考證
乾隆十九年甲戌 (1754)	范家相 (1715–1769, 浙江會稽) 成《三家詩拾遺》十卷。 案：是書有乾隆十九年會稽范氏刊本。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1762)	余蕭客 (1729–1777, 江蘇吳縣) 成《古經解鈎沈》三十卷。 案：是書冊始於乾隆二十四年，成稿於二十七年，卷六、七採擷三家《詩》舊文，其中以《韓詩》最多，共一百六十五則。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1780)	盧文弨 (1717–1795, 浙江餘姚) 校勘王應麟《詩攷》畢，有《增校詩攷》四卷。 案：《增校詩攷》只有鈔本。據張祝平〈「三家詩」輯佚研究的重要系列著作〉的研究，盧氏先後兩次增校《詩攷》，第一次完成於

⁹⁷ 首先，《詩緯》類著述不在拙文收錄體例之列，故房文附錄收錄的十種《詩緯》類著述拙文一概不收。其次，房文附錄部份資料有誤，如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的「陳鱣《三家詩拾遺》十卷稿本」，實是陳鱣抄錄范家相《三家詩拾遺》的抄本。又如陳玉樹《毛詩異文箋》，實是於《毛詩》傳疏中「訓同文異者箋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419），是研究《毛詩》而非三家《詩》的著述。又房文附錄稱時庸勳有「《韓詩毛詩韻訂》不分卷」，見於「單縣時氏音學遺著稿本」及「時氏音學叢稿本」，但據《山東文獻集成》第一輯影印山東省博物館所藏單縣時氏音學遺著，時氏只有《毛詩吟串》、《毛詩古均貫》兩種《詩》韻著述，另外有時氏摘抄苗夔《苗氏毛詩吟訂摘異》一種，未聞有《韓詩毛詩韻訂》一書（詳參《山東文獻集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冊6–8）。又秦更生年於清末光緒十一年（1885），卒於1956年，是民國時期的學者，其《韓詩外傳校勘記》不應列為清代三家《詩》學著述。趙善詒為近代學者，1982年仍以古稀之齡撰就《新序疏證》，將其《韓詩外傳補正》、《韓詩外傳佚文考》歸入清代三家《詩》學著述，殊為不妥。因此，以上各種著述拙文皆不收錄。

年份	三家《詩》學著述繫年及考證
	乾隆十五年(1750)，第二次完成於乾隆四十五年，成書後只有鈔本。 ⁹⁸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胡文英(生卒年不詳，江蘇武進)成《詩攷補》二卷。 案：是書有乾隆四十九年留芝堂刻本。 嚴蔚(生卒年不詳，江蘇吳縣)成《詩考異補》二卷。 案：是書有乾隆四十九年二酉齋刻本。嚴氏為王鳴盛(1722-1798)弟子，亦為乾嘉學者。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	宋綿初(1740-?，江蘇高郵)成《古韓詩說證》九卷。 案：是書有乾隆五十四年述古堂刻本。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趙懷玉(1747-1823，江蘇陽湖)刊刻《韓詩外傳》校本十卷、《補逸》一卷。 案：是書有乾隆五十五年趙氏亦有生齋刻本。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周廷棠(生卒年不詳，安徽績溪)成《韓詩外傳校注》十卷，周宗杭(生卒年不詳，安徽績溪)《拾遺》一卷。 案：此書有乾隆五十六年周氏營道堂刊本。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宋綿初(見上)成《韓詩內傳徵》四卷，《補遺》一卷，《敘錄》二卷。 案：是書有乾隆六十年志學堂刻本。
嘉慶元年丙辰(1796)	沈清瑞(1758-1791，江蘇長洲)《韓詩故》二卷刊刻。 案：是書為沈氏遺作，於嘉慶元年刊刻，收入《沈氏群峰集》。
嘉慶三年戊午(1798)	王謨(1731-1817，江西金溪)輯《漢魏遺書鈔》成，內有《魯詩傳》一卷、《韓詩內傳》一卷、《韓詩翼要》一卷。 案：《遺書鈔》於嘉慶三年刊刻。 王初桐(生卒年不詳，江蘇嘉定)成《齊魯韓詩譜》四卷。 案：是書有嘉慶三年刻本。王初桐編《方泰志》卷三〈藝文〉著錄：「《齊魯韓詩譜》四卷，王初桐撰，嘉慶三年刻於山東。」 ⁹⁹ 郝懿行(1757-1825，山東棲霞)成《韓詩外傳考證》十卷。 案：《曬書堂集》卷三收入郝氏嘉慶三年序。 ¹⁰⁰
嘉慶六年辛酉(1801)	周邵蓮(生卒年不詳，江西奉新)成《詩攷異字箋餘》十四卷。 案：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錄，是書有嘉慶刻本，惟未注明刊刻年份。 ¹⁰¹ 周邵蓮嘉慶四年十二月之〈自識〉云：「伯厚《詩攷》三家外，更有《異字異義》、《逸詩》，旁搜墜緒，意良勤矣。間就

⁹⁸ 張祝平：〈「三家詩」輯佚研究的重要系列著作〉，頁607。

⁹⁹ 《方泰志》，卷三，頁一〇上。

¹⁰⁰ 郝懿行：《曬書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年(1884)東路廳署刻本，卷三，頁一二上至一三下。

¹⁰¹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98年)，經部，頁164。

年份	三家《詩》學著述繫年及考證
	伯厚未登者錄之，前人論著及管見一二附焉。歲月既久，浸以成裘。」 ¹⁰² 周序後又有嘉慶六年翁方綱序，則按理此書當刻於嘉慶六年。又周氏為乾隆己酉(1729)舉人。
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	<p>臧庸(1767-1811, 江蘇武進)《韓詩遺說》二卷、《訂詒》一卷刊刻。</p> <p>案：是書同治九年由趙之謙(1829-1884)據錢塘何元錫(1766-1829)鈔本補錄汪憲(1721-1771)振綺堂寫本刊刻，是為最早的刊刻本。¹⁰³臧庸輯校《韓詩遺說》不知始於何年，吉川幸次郎〈臧在東先生年譜〉僅於「遺書目錄」提及此書，云：「問經堂叢書列目未刊，有光緒六年會稽趙氏〔趙之謙〕仰祝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刊本，光緒乙未元和江氏〔江標，1860-1899〕靈鶴閣刊本。」¹⁰⁴《韓詩遺說》初為鈔本，臧氏此書原稿據《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載錄，現藏上海圖書館，編者案曰：「此帙有臧庸手跋，復勘校正處係其親筆。傳世鈔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之舊稿，不如此帙精確完備。」¹⁰⁵今賴《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始得見臧稿，雖僅有《韓詩遺說》首尾圖版兩幀，已彌足珍貴。尤可注意者，是末葉圖版有臧氏跋語，清晰可辨，臧氏跋云：「此庸舊輯本。嘉慶己巳三月，晤嘉善朱椒堂駕部於杭州撫署，索鈔此冊寄都中。余假歸里門，為校正數事，命奴子潘壽寫以誥之，余為覆勘，時四月十九日，用中記於常州岳園。」¹⁰⁶〈臧在東先生年譜〉「嘉慶十四年己巳四十三歲」條記：「三月自杭還里，後復往杭。」¹⁰⁷又陳鴻森〈臧庸年譜〉於此年亦云：「在杭州阮元節署。」¹⁰⁸皆與臧跋契合。又朱椒堂即朱為弼(1771-1840)。嘉慶二年，阮元選浙江學者編纂《經籍纂詁》，臧庸為總纂，朱為弼為分纂，二人同於阮府幕府共事。¹⁰⁹朱氏於嘉慶十四年索鈔《韓詩遺說》，臧氏為之覆校，距臧氏於十六年(1811)病故不足兩年，據此可知此稿當為臧氏手校定本。</p>

¹⁰² 周邵蓮：《詩攷異字箋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刻本，〈自識〉，頁一上。

¹⁰³ 趙之謙〈序〉云：「余所藏得自錢塘何氏夢華館，辛酉亂後失去。乙丑冬，復獲之坊肆，已闕三葉。仁和譚仲儀有汪氏振綺堂寫本，遂段歸補錄，復為完書。」見趙之謙：〈序〉，載臧庸：《韓詩遺說》，頁一上。

¹⁰⁴ 吉川幸次郎：〈臧在東先生年譜〉，《東方學報》(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6冊(1936年)，頁299。

¹⁰⁵ 《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稿本」冊，頁153。

¹⁰⁶ 同上注，頁152。

¹⁰⁷ 吉川幸次郎：〈臧在東先生年譜〉，頁295。

¹⁰⁸ 陳鴻森：〈臧庸年譜〉，《中國經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2輯(2007年)，頁299。

¹⁰⁹ 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頁116。

年份	三家《詩》學著述繫年及考證
嘉慶十五年庚午 (1810)	葉鈞 (生卒年不詳, 廣東嘉應) 刻《重訂三家詩拾遺》十卷。 案: 是書重訂范家相《三家詩拾遺》, 又增《三家詩傳授源流》一卷, 收入嘉慶十五年葉氏詒谷堂《嶺海樓叢書》。葉氏為乾隆甲寅 (五十九年, 1794) 解元。
嘉慶十七年壬申 (1812)	迺鶴壽 (1773-?, 江蘇吳江) 成《齊詩翼氏學》四卷。 案: 是書有嘉慶十七年蓬萊山房刻本。
嘉慶十八年癸酉 (1813)	馮登府 (1780-1841, 浙江嘉興) 成《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 案: 是書道光十年 (1830) 由四明學舍刊刻, 但史詮編《馮柳東先生年譜》「嘉慶十八年」條記: 「《三家詩異文疏證》成。」 ¹¹⁰ 是《疏證》早於嘉慶十八已有成稿。
嘉慶十九年甲戌 (1814)	嚴可均 (1762-1843, 浙江歸安) 《韓詩輯編》稿二十一卷, 附《魯詩》、《齊詩》、《漢人詩說》。 案: 是書未經刊刻, 稿藏臺灣國家圖書館。 ¹¹¹ 稿本繫於此年, 主要根據嚴可均於道光十四年 (1834) 致徐松 (1781-1848) 書, 嚴氏〈答徐星伯同年書〉云: 「二十年前〔此書寫於道光十四年甲午臘月八日, 二十年前即嘉慶十九年甲戌〕, 校輯經佚、注佚、子書等數十種。」 ¹¹² 信末具列總目凡七十三種, 包括《韓詩輯編》。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1818)	陳士珂 (生卒年不詳, 湖北蘄水) 成《韓詩外傳疏證》十卷。 案: 是書有嘉慶二十三年《文淵樓叢書》刻本。張映漢《韓詩外傳疏證·序》云: 「戊寅之夏, 其文孫國錄、沆庶、常澣以假歸舉, 是書付劄鬪氏。」 ¹¹³
道光元年辛巳 (1821)	錢攻 (生卒年不詳, 浙江上虞) 成《〈韓詩內傳〉並〈薛君章句〉攷》四卷。 案: 是書稿本現藏上海復旦大學, 鈔本現藏臺灣國家圖書館。卷首有杜堯、周喬齡〈序〉, 卷末有錢攻識語, 並寫於道光元年。錢氏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
道光三年癸未 (1823)	丁晏 (1794-1875, 江蘇山陽) 成《詩攷補注》二卷、《補遺》一卷。 案: 是書有道光三年刻本。

¹¹⁰ 史詮 (編): 《馮柳東先生年譜》, 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9年), 頁311。

¹¹¹ 著錄詳參《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 國家圖書館, 1996年), 頁93。

¹¹² 嚴可均: 《鐵橋漫稿》, 《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八年 (1838) 四錄堂刻本, 卷三, 頁一六上。

¹¹³ 陳士珂: 《韓詩外傳疏證》, 《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清嘉慶二十三年 (1818) 《文淵樓叢書》本, 〈序〉, 頁一下。

年份	三家《詩》學著述繫年及考證
道光九年己丑 (1829)	魏源 (1794–1857, 湖南邵陽) 成《詩古微》二卷, 是為初刻本。 案: 是書有道光九年修吉堂刻本。黃麗鏞《魏源年譜》「道光九年 (1829)」條記:「魏源撰《詩古微》, 成二卷, 修吉堂刊。」 ¹¹⁴
道光十年庚寅 (1830)	徐璈 (1779–1841, 安徽桐城) 成《詩經廣詁》三十卷。 案: 是書載錄三家《詩》說甚多, 有道光十年刻本。
道光十八年戊戌 (1838)	李富孫 (1764–1843, 浙江嘉興) 成《詩經異文釋》十五卷。 案: 李富孫《校經叟自訂年譜》「道光十八年」條記云:「在家, 蔣君仍屬校勘叢書。重校《詩異文釋》十五卷, 蔣君捐貲, 續刻入七經中。」 ¹¹⁵
道光十九年己亥 (1839)	黃位清 (生卒年不詳, 廣東番禺) 成《詩異文錄》三卷。 案: 是書有道光十九年刻本。 許瀚 (1797–1866, 山東日照) 成《韓詩外傳校議》稿。 案: 許瀚《韓詩外傳校議》刊刻於許氏卒後, 收入《攀古小廬雜著》, 丁原基《許瀚之文獻學研究》指出《攀古小廬雜著》「係許瀚臨終時, 將遺稿囑交陳介祺, 後由吳重熹延丁良善校訂, 光緒間刊板」。 ¹¹⁶ 本文不把《韓詩外傳校議》成書年份繫於光緒年間, 原因有三: (一) 無法確知《攀古小廬雜著》刊刻於光緒何年; (二) 許瀚於同治五年 (1866) 去世, 距離《攀古小廬雜著》可能刊刻的最早年份 (即光緒元年, 1875) 達八年; (三) 最重要的考慮是《韓詩外傳校議》早在道光十九年已經成稿, 據《許瀚日記》「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條記載, 許瀚當日「早出城, 過湯老師處, 未見。□稿及韓傳呈閱」。整理者崔巍注曰:「許瀚對湯金釗 (1772–1856) 執弟子禮, 有著述常呈湯氏審閱, 稿上不知何字, 韓傳即許氏所著《韓詩外傳校補》〔當為《韓詩外傳校議》〕。」 ¹¹⁷ 如果從成稿日計算, 至光緒元年, 相距達三十六年之久, 未能反映許氏撰寫《韓詩外傳校議》的年代, 故此處以此書成稿年份為據。

¹¹⁴ 黃麗鏞:《魏源年譜》(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85。黃氏證據主要是胡承珙致陳奐及魏源的兩通信,其中〈答陳碩甫明經書〉云:「魏默深聞刻《詩古微》二卷,不知其去歲曾到杭州,頃已寄書都中,向索所著矣。」(《求是堂文集》,卷三,頁一四上)另〈與魏默深書〉云:「自丙戌奉書後,曠焉三載,山川間之,無繇通問,雞鳴風雨,我勞如何?前承大著《詩古微》一冊,發難釋滯,迴出意表,所評四家異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論。」(同上,卷三,頁三五上)黃氏案曰:「魏源撰《詩古微》,先成二卷,但未著明成書年代。據胡承珙〈答陳碩甫明經書〉和〈與魏默深書〉,可知在道光九年已撰成刊刻。」(《魏源年譜》,頁87)

¹¹⁵ 李富孫:《校經叟自訂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頁445。

¹¹⁶ 丁原基:《許瀚之文獻學研究》(臺北:華正書局,1999年),頁108。

¹¹⁷ 許瀚(著)、崔巍(整理):《許瀚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16。

年份	三家《詩》學著述繫年及考證
道光二十年庚子 (1840)	<p>魏源 (見上) 成《詩古微》二十卷，是為二刻本。</p> <p>案：《魏源年譜》「道光二十年」條記云：「魏源重刻《詩古微》二十卷，並撰《詩古微序》。」¹¹⁸與只有二卷的初刻本比較，內容大增，當別為一種。</p> <p>馮登府 (見上) 成《三家詩遺說》八卷。</p> <p>案：是書只有鈔本，現藏天津圖書館。據該館網上著錄資料，「清馮登府撰，李富孫校，清鈔本。二冊，十一行二十三字，白口，無欄格。登府於詩，著有三家遺說，人多知之，然未曾付梓。此本為舊鈔未刻本，為天津圖書館之僅存，城為天壤間珍本」。¹¹⁹考《馮柳東先生年譜》「道光二十年」條記云：「《三家詩遺說》八卷成。」是稿成於此年。¹²⁰《續修四庫全書》據天津圖書館藏鈔本複印，卷八末葉有李富孫題識云：「壬寅〔道光二十二年，1842〕李富孫校過，時年七十有九，為之泣然揮涕，亦不負故人病時所屬也。」¹²¹故人指馮登府。馮氏歿於道光二十一年 (1841)，則《遺說》肯定成書此年以前，參照年譜，知《遺說》成於道光二十年。</p> <p>馮登府 (見上) 成《三家詩遺說翼證》稿。</p> <p>案：《三家詩遺說翼證》成稿當晚於《三家詩遺說》，馮氏在道光二十一年歿，則《翼證》當在此年成稿。</p> <p>龔橙 (1817-?)，浙江仁和) 成《詩本誼》稿。</p> <p>案：據《詩本誼·序》，此書成稿於道光二十年，¹²²但直到光緒二十五年 (1889) 始由譚獻刊入《半厂叢書》中。</p>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1843)	<p>陳壽祺 (1771-1834，福建侯官)、陳喬樞 (1809-1869，福建侯官) 成《三家詩遺說攷》五十卷。</p> <p>陳喬樞 (見上) 成《詩經四家異文攷》五卷。</p> <p>陳喬樞 (見上) 成《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p> <p>案：三書皆有道光二十三年《左海續集》刻本。</p>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1846)	<p>馬國翰 (1794-1857，山東歷城)《玉函山房輯佚書》成，內有《魯詩故》三卷、《齊詩傳》二卷、《韓詩故》二卷、《韓詩內傳》一卷、《韓詩說》一卷、《韓詩薛君章句》二卷、《韓詩翼要》一卷。</p> <p>案：據曹書杰《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考證，《玉函山房輯佚書》是隨刊隨印樣，故馬氏生前並無定本，其中所輯經部佚書，初刻於道光二十六年。¹²³</p>

¹¹⁸ 黃麗鏞：《魏源年譜》，頁116。

¹¹⁹ 詳參天津圖書館網上書目查詢系統，網址是：<http://www.tjlib.cn/gcjp/sbtl/sjs.htm>。

¹²⁰ 史詮：《馮柳東先生年譜》，頁339。

¹²¹ 馮登府：《三家詩遺說》，《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頁794。

¹²² 龔橙：《詩本誼》，《叢書集成續編》影印《半厂叢書》初編本，〈序〉，頁九上。

¹²³ 曹書杰：《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60。

年份	三家《詩》學著述繫年及考證
咸豐二年壬子 (1852)	<p>黃奭 (1810–1853, 江蘇甘泉) 成《漢學堂經解》，包括《魯詩傳》一卷、《齊詩傳》一卷、《韓詩內傳》一卷。</p> <p>案：據王鑾《黃氏逸書攷·序》，黃奭所輯《黃氏逸書攷》「屬於經者曰《漢學堂經解》；屬於緯者曰《通緯》，識附焉；屬於子史者曰《子史鈎沈》；屬於鄭氏之學者曰《通德堂經解》」。惟此書「工甫竣，值咸豐兵燹，避亂鄉居，板存蕭寺，先生旋捐館舍，寺僧不知護惜，散失數十種」。¹²⁴所謂咸豐兵燹，即咸豐三年二月太平軍攻佔揚州一事，黃氏於此年避亂鄉間，遽卒，則《漢學堂經解》刊行當在咸豐二年。</p>
咸豐四年甲寅 (1854)	<p>周曰庠 (生卒年不詳, 浙江山陰) 成《詩經三家註疏》稿。</p> <p>案：據《續修四庫總目提要》，是書僅殘存二卷，存北平圖書館，即後來的北京圖書館，「起於《周南·關雎》，止於《衛風·二子乘舟》，前有周氏凡例，及咸豐四年甲寅浙江督糧道畢陽周起濱序」。¹²⁵又據《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該館藏有此稿鈔本，「半葉九行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無行格，三冊，竹紙」。¹²⁶</p>
光緒三年丁丑 (1877)	<p>蔣曰豫 (1830–1875, 江蘇陽湖) 《韓詩緝》一卷刊刻。</p> <p>案：是書有光緒三年蓮池書局刊《蔣侑石遺書》本。¹²⁷</p>
光緒十八年壬辰 (1892)	<p>陶方琦 (1845–1884, 浙江會稽) 《韓詩遺說補》一卷刊刻。</p> <p>案：此書有清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漢孳室文鈔》刻本，卷首有陶氏序曰：「近歲得見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希麟《續音義》及日本新刻《玉篇》零部、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次第補輯《韓詩》一百五十餘條，其義多臧氏未采。」¹²⁸光緒六年，楊守敬在日本訪得慧琳《一切經音義》。其後，黎庶昌、羅振玉在日本分別發現原本卷子《玉篇》殘卷。陶氏歿於光緒十年 (1884)，則《韓詩遺說補》當成稿於光緒六年至十年間，距刊刻之年不過十年。</p>
光緒十九年癸巳 (1893)	<p>顧震福 (?–1935, 江蘇山陽) 成《三家詩遺說續攷》六卷。</p> <p>案：是書有光緒十九年顧氏自刻本。¹²⁹《三家詩遺說續攷》包括《魯詩遺說續攷》一卷、《齊詩遺說續攷》一卷、《韓詩遺說續攷》四卷。</p>

¹²⁴ 黃奭：《黃氏逸書攷》，〈序〉，頁一上至一下。

¹²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439。

¹²⁶ 韓兆海 (主編)：《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第一輯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18。

¹²⁷ 蔣秋華、王清信：〈清代詩經著述現存版本目錄初稿·三家詩之屬〉，頁719。

¹²⁸ 陶方琦：《漢孳室文鈔》，卷四，頁一〇下。

¹²⁹ 呂幼樵：《書目答問校補》，頁27。

年份	三家《詩》學著述繫年及考證
光緒二十年甲午 (1894)	王仁俊 (1866–1913, 江蘇吳縣) 成《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包括《魯詩韋氏說》、《韓詩外傳佚文》、《韓詩翼要》、《韓詩趙氏學》各一卷。 案：是書有光緒二十年《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本。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1895)	阮元 (1764–1849, 江蘇儀徵) 《三家詩補遺》刊刻。 案：阮元在世之時，其師友弟子未嘗言及《三家詩補遺》一書，近人王章濤《阮元年譜》亦僅著錄此書，未辨成稿年份。此書得以重見天日者，則始於葉德輝 (1864–1927) 自北京購得手稿。葉氏《郅園讀書志》云：「《三家詩稿》二冊，阮元手稿本。此《三家詩稿》原係散紙一束，見之都門隆福寺地攤，因首有阮伯元父四字朱文篆書方印，余頗留意，知其非尋常破紙也，因購歸。」 ¹³⁰ 光緒二十一年葉氏將稿交儀徵李洛才以《崇惠堂叢書》名刊刻。 ¹³¹ 光緒二十四年 (1898)，葉氏鑑於李刻間有舛錯，遂重刊，收入《觀古堂彙刻書》首冊。由於是書成稿年份無法確考，本表以成書年份繫年。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1899)	俞樾 (1821–1906, 浙江德清) 成《讀韓詩外傳》一卷。 案：是書有光緒二十五年《春在堂全書》本。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1907)	皮錫瑞 (1850–1908, 湖南善化) 成《詩經通論》一卷。 ¹³² 案：是書有光緒三十三年本，收入《經學通論》。
宣統元年己酉 (1909)	江瀚 (1853–1931, 福建長汀) 成《詩經四家異文攷補》。 案：是書有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原書無序。
民國五年 (1916)	王先謙 (1842–1918, 湖南長沙) 成《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 案：是書有民國五年虛受堂家刻本。
民國八年 (1919)	張慎儀 (1846–1921, 四川成都) 成《詩經異文補釋》十六卷。 案：是書有民國八年《箋園叢書》本。
民國二十五年 (1936)	楊晨 (1845–1903, 浙江黃岩) 《詩攷補訂》五卷刊刻。 ¹³³ 案：是書有民國二十五年楊氏《崇雅堂叢書》鉛印本。

附：年份未能確定之清代三家《詩》學著述

作者	著目及考證
凌樹屏 (1712–?, 浙江烏程)	《詩經異文別說存》十四卷 (鈔本) 案：《詩經異文別說存》只有乾隆四十五年沈澄鑑鈔本，存卷八至卷十四，現藏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 ¹³⁴ 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¹³⁰ 葉德輝：《郅園讀書志》(臺北：明文書局影印上海澹園 1928 年版，1990 年)，冊 1，頁 97。

¹³¹ 葉德輝：《三家詩補遺·序》，載阮元：《三家詩補遺》，《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李氏《崇惠堂叢書》本，頁二下。

¹³² 據洪湛侯：《詩經學史》，頁 604–6。

¹³³ 據張祝平：〈「三家詩」輯佚研究的重要系列著作〉，頁 609。

¹³⁴ 蔣秋華、王清信：〈清代詩經著述現存版本目錄初稿·三家詩之屬〉，頁 723。

作者	著目及考證
王謨 (1731–1817, 江西金溪)	《韓詩拾遺》十六卷 ¹³⁵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曾廷枚 (1734–1816, 江西南城)	《毛齊魯韓四家詩異同》 ¹³⁶ 案：是書成書年份不可考。
丁杰 (1738–1807, 浙江歸安)	《詩攷》校本 (稿本)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惟盧文弨《增校王伯厚《詩攷》序》云：「近又得歸安丁小雅校本，凡王氏之沿訛互異者，一一釐革。」此序寫於乾隆四十五年，是書肯定於此年前成稿。 ¹³⁷
邵晉涵 (1743–1796, 浙江餘姚)	《韓詩內傳考》不分卷 (鈔本)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惟阮元《邵氏遺書·序》云：「《韓詩內傳考》一卷，……未刊。」 ¹³⁸ 可見是書未經刊刻。
趙紹祖 (1752–1833, 安徽涇縣)	《校補王氏詩考》二卷 ¹³⁹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馮登府 (1780–1841, 浙江嘉興)	《三家詩異字詁》三卷 (稿本) 《三家詩異文釋》三卷，《補遺》三卷 (稿本) 案：嘉慶十八年，馮登府成《三家詩異文疏證》稿本六卷，其書與《三家詩異文釋》、《三家詩異字詁》並為考釋三家《詩》經文異字之作，成稿當早於嘉慶十八年。浙江圖書館藏有馮氏《三家詩異文釋刪減》，是為《異文釋》的節本，此稿跋文謂出自《三家詩異字詁》，賀廣如據此指出馮氏三書成稿的先後次序當為先成《異字詁》，然後《刪減》，最後才是《疏證》。 ¹⁴⁰
李貽德 (1783–1832, 浙江嘉興)	《詩考異》(稿本) ¹⁴¹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朱士端 (1786–?, 江蘇寶應)	《齊魯韓三家詩注》三卷 (稿本) 《齊魯韓三家詩釋》十六卷 (稿本) 案：此二種成稿年份不可考。
汪遠孫 (1789–1835, 浙江錢塘)	《韓詩補遺》(稿本) ¹⁴²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¹³⁵ 據陳鴻森：〈《韓詩遺說》補註〉，頁18，注2。

¹³⁶ 據房瑞麗：〈清代三家《詩》著述目錄考〉，頁176。

¹³⁷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頁15。

¹³⁸ 據黃雲眉(編)：《清邵二雲先生晉涵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26。

¹³⁹ 據朱師轍：《清史稿藝文志補編》，頁355。

¹⁴⁰ 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頁306，注4。

¹⁴¹ 據房瑞麗：〈清代三家《詩》著述目錄考〉，頁176。

¹⁴² 據宋抱慈：《兩浙著述考》，頁277。

作者	著目及考證
陳慶鏞 (1795-1858, 福建晉江)	《三家詩攷》(稿本) ¹⁴³ 案：陳氏有《籀經堂類藁》二十四卷，卷首有何秋濤 (1824-1862) 序，述及陳氏著述云：「未梓者則《三家詩攷》。」 ¹⁴⁴ 此序寫於道光二十六年，據此則《三家詩攷》成稿於此年以前。
徐堂 (1797-1837, 江蘇吳江)	《三家詩述》十卷 (稿本)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顧觀光 (1799-1862, 江蘇金山)	《韓詩外傳逸文》一卷 (稿本) ¹⁴⁵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葉裕仁 (1809-1879, 江蘇鎮洋)	《三家詩攷箋證》二卷 (鈔本) ¹⁴⁶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董沛 (1828-1895, 浙江鄞縣)	《韓詩箋》六卷 (稿本) ¹⁴⁷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郭慶藩 (1844-1896, 湖南湘陰)	《詩異文考證》八卷 (稿本) ¹⁴⁸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
龍璋 (1854-1918, 湖南攸縣)	《韓詩》一卷 ¹⁴⁹ 案：是書有活字本。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書乃龍氏從卷子《玉篇》及慧琳《音義》等書中輯錄而成，則是書必定在光緒六年以後所輯。
皮嘉祐 (1860 ¹⁵⁰ -?, 湖南善化)	《韓詩疏證》 ¹⁵¹ 案：是書成書年份不可考。
陶方琦 (1845-1884, 浙江會稽)	《魯詩故訓纂》 ¹⁵² 案：是書成書年份不可考。

¹⁴³ 據郭霽春：《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頁12。

¹⁴⁴ 陳慶鏞：《籀經堂類藁》，《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九年(1883)刻本，〈序〉，頁二上。

¹⁴⁵ 據孫啟治等：《古佚書輯本目錄附考證》，頁35。

¹⁴⁶ 據王祖畚等：《鎮洋縣志》，卷一一，頁二上。

¹⁴⁷ 據宋抱慈：《兩浙著述考》，頁283。

¹⁴⁸ 據房瑞麗：〈清代三家《詩》著述目錄考〉，頁179。案：稿本現藏湖南圖書館，房文原作一卷，但據湖南圖書館著錄，是書當為八卷一冊，今訂正。

¹⁴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449。

¹⁵⁰ 據皮名振(編著)：《清皮鹿門先生錫瑞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9。皮嘉祐為皮錫瑞仲子，《年譜》「同治十年〔1860〕」條云：「六月初九日，公仲子嘉祐生。」

¹⁵¹ 陳鴻森：〈《韓詩遺說》補註〉，頁1；頁18，注5。

¹⁵² 陶方琦：《漢孳室文鈔》，卷三《魯詩故訓纂·敘》，頁二二下至二七上。

作者	著目及考證
汪照(生卒年不詳,江蘇嘉定)	《齊魯韓三家詩義證》(稿本) ¹⁵³ 案:王昶(1725-1806)嘉慶八年輯《湖海詩傳》,卷三有「汪照」條,下云汪氏「晚年窮經義,有《齊魯韓三家詩義證》」。準此,則汪氏此書肯定在嘉慶八年以前成稿。
黃模(生卒年不詳,浙江錢塘)	《三家詩補考》(稿本) ¹⁵⁴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黃氏嘉慶五年(1800)拔貢。
陳岫(生卒年及籍貫不詳)	《詩攷異再補》二卷(稿本)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現藏清華大學圖書館。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著錄,此書「一冊一函,稿本」,「十行二十三字,無行格。……蔚〔嚴蔚〕之妻弟陳岫再補,然未付刻,此為稿本」。 ¹⁵⁵ 嚴蔚為乾嘉時人,陳岫亦當與其同時。
黃啟興(生卒年不詳,江西婺源)	《詩考》五卷,《附錄》一卷(鈔本) ¹⁵⁶ 案:是書成書年份不可考。胡培翬(1782-1849)《研六室文鈔》卷六有〈黃氏《詩考》序〉,云:「婺源程君竹溪以其同邑黃氏《詩考》五卷示余而屬為序。」又云:「黃氏名啟興,字石香。……道光戊子入都應京兆試。」 ¹⁵⁷ 道光戊子即道光八年(1828)。
曹家駒(生卒年不詳,浙江仁和)	《詩三家異文詁》(稿本) ¹⁵⁸ 案:是書成稿年份不可考。龔自珍(1792-1841)道光八年撰《大誓答問》一卷。 ¹⁵⁹ 龔自閔《龔氏科名錄》「大誓答問」條下注云:「是集劉〔逢祿〕有序,曹〔家駒〕有跋。」 ¹⁶⁰ 曹氏當亦與龔氏同時。
李德淑(生卒年不詳,湖南常寧)	《毛詩經句異文通詁》七卷 ¹⁶¹ 案:是書成書年份不可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是編以宋王應麟參取齊魯韓三家異同,撰為《詩攷》,既多遺漏,又未注明某篇某卷某字之音義若何,學者難於檢尋。遂以《毛詩》為主,而博采齊魯韓三家之訓詁,廣搜字書之通釋,以補其缺。」 ¹⁶²

¹⁵³ 據王昶:《湖海詩傳》,卷三〇,頁一九上。

¹⁵⁴ 據宋慈抱:《兩浙著述考》,頁277。

¹⁵⁵ 清華大學圖書館(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4。

¹⁵⁶ 據房瑞麗:〈清代三家《詩》著述目錄考〉,頁176。

¹⁵⁷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七年(1837)涇川書院刻本,卷六,頁七下至八上。

¹⁵⁸ 據李榕:《杭州府志》,卷八六,頁一五下。

¹⁵⁹ 吳昌綬(編):《定盦先生年譜》,載王佩瑀(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615。

¹⁶⁰ 同上注,頁77。

¹⁶¹ 據房瑞麗:〈清代三家《詩》著述目錄考〉,頁180。

¹⁶² 葉啓勳:〈《毛詩經句異文通詁》提要〉,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435。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Works on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Dates of the Work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Authors

(A Summary)

Cheung Kam Siu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pi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larly works on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by reviewing the dates when the forty-eight books or manuscripts were written and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sixty-five authors.

The endeavours at collecting and compiling the lost tex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the Three Schools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not only because compilation is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reassessing the Three Schools,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from Jiangsu 江蘇 and Zhejiang 浙江 provinces where evidential research was earnestly promoted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s a result, the pioneering work made by Wang Yinglin's 王應麟 *Shi kao* 詩攷 drew enormous attentions among the scholars, and they continued and corrected Wang's research and its textual variants. On the other hand, thanks to the number of lost writings of Han School still widely preserved in the ancient texts, its collection and study made flourishing advancement in the Qianlong 乾隆 and Jiaqing 嘉慶 periods.

The expansion of the methods of collecting and compiling lost writings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道光 periods leads to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collected materials. By examining these materials in which different characters were especially focused, scholars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value of the Three Schools and opined that they were much superior to the Mao School. In the mid Daoguang period, Wei Yuan 魏源, who sought to undercut the Mao School from monopoliz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accentuat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Three Schools in his *Shi gu wei* 詩古微.

In the Guangxu 光緒 period, Wang Xianqian 王先謙 started his work of *Shi sanjia yi jishu* 詩三家義集疏. Wang's inheritanc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cholarly works on the Three Schools in the Qing dynasty enabled him to finish a complete and annotated edition of the Three Schools. Wang succeeded in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restoring the long-lost commentaries of the Three Schools and thus provided the Three Schools an equal footing to compete with the Mao School.

關鍵詞：三家《詩》 清代經學 輯佚 著述年份 作者地理分布

Keywords: *Three Schools of Poetry*, classics study in the Qing dynasty, col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lost texts, dates of works,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authors